



《重庆地方志》编委会

主 任：何晓栋

副 主 任：徐 斌

委 员：曾 伟 郭永彬 董宁波
熊蜀黔 夏吉敏 陈 伟
司逸澈

《重庆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徐 斌

执 行 主 编：熊蜀黔

执行副主编：陈 伟

编 辑：周怡彤 张 莉 陈欣如

校 对：黄仕洁 邱雨婷

主 办：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 辑：《重庆地方志》编辑部

地 址：重庆市江北区建北四支路
4号信一金典4楼

邮 编：400020

联系电话：023-89075121

电子邮箱：cqdfz2017@163.com

印 刷：中雅(重庆)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渝) 2024700

目 录

CONTENTS

志鉴研究

- 论第三轮志书凡例的制订…………… 詹跃华 (2)
浅析高质量编辑地方综合年鉴图片…………… 刘增明 赵若璇 (9)
地方志里的巴文化：传承、变迁及当代价值…………… 夏小平 (16)

文史纵横

- 为了一次穿越百年的邂逅
——在尘封百年的档案中探寻游曦印记 …………… 曾向前 (25)
抗战烽火中的万盛担当…………… 费国容 (36)
治今彭水的涪陵县设置考…………… 王 东 王业培 刘应平 (41)
云阳茶事…………… 叶仁军 (45)

地情揽胜

- 丰盛赶场…………… 刘凡君 (48)
说说米亭子…………… 江春葆 (56)
江津古道行：跫音叩响的地理琴弦 …………… 强 雯 (59)

工作动态

- 市志办主任何晓栋调研北碚区、沙坪坝区地方志工作…………… (封二)
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室来渝考察交流…………… (封三)

论第三轮志书凡例的制订

詹跃华

凡例，是冠于志书之首，规定和制约志书编纂全过程的行为规则。它是志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志书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可以提高志书的整体性、科学性、资料性。但是，在首轮和第二轮志书中，有的凡例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憾的地方。目前，第三轮志书编修工作即将全面启动，如何制订好第三轮志书凡例，弥补首轮和第二轮志书凡例之缺憾，笔者认为，编纂人员要重新认识凡例的涵义与作用、把握凡例的内容与编排、掌握凡例的制订与要求，以及凡例制订应注意的问题。

一、认识志书凡例的涵义与作用

制订第三轮志书凡例，编纂人员首先要重新认识凡例的涵义与作用，深刻理解凡例的内涵要义和重要作用，真正从思想上予以重视，为制订科学合理的凡例奠定基础。

（一）志书凡例的涵义

凡例，最早语出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

所谓“发凡以言例”，即“发凡起例”，指凡例而言，“发凡”是阐明著述的宗旨、大纲、概要，“起例”是拟定著述的体例、格局、样式及规则条例。在历代所编纂的旧志中，凡例的名称存在多种，有称志例、志议，也有称略例、总例、序例、叙例、发例、起例，还有称例言、约言等。虽然这些凡例的名称不尽相同，内容各有侧重，有提示志书编纂的目的，有对志书编纂内容作出规定和说明，有阐明志书的源流，但是多用于规定志书的编纂体例和原则。后来，人们把说明著作宗旨、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称为凡例。

凡例一词，各类词典的解释大同小异，如商务印书馆2016年9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书前关于该书体例的说明”，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辞海》解释为“说明著作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黄山书社1986年11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词典》解释为“方志的编辑说明，叙述方志编纂体例与著作内容等”。目前，编纂人员对志书凡例涵义的理解存在两种意见：一

是把凡例中的“例”字理解为体例形式，主要解决志书编纂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二是把凡例中的“例”字理解为义例，不限于志书的内容和编纂的方法，还应包括志书编纂的宗旨、指导思想。从已出版的首轮和第二轮志书凡例看，后一种意见为大多数人所采用。

（二）志书凡例的作用

凡例文字虽不多，却是志书编纂之要务。历代史学家、方志学家都把它提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如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序例》中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把凡例比作国家法令；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从修志实践中总结出修志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把“断凡例”的“识”放在三长之首；当代方志学者傅振伦考察众多新旧志书深有体会地说“修志之道，先严体例。义不先立，例无由起，故志家必以凡例冠之”，可见凡例在修志中的重要性。

由于凡例在修志中非常重要，历代编纂志书都很重视制订凡例。如明永乐十六年（1418）颁布的《纂修志书凡例》21条，清康熙十一年（1672）颁布的《修志四十款》，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22条等，均是历史上全国性的修志规则，可称为历史上修志工作的大凡例、总凡例，对于全国修志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凡例作为志书编纂体例问题的统一

规定和理论说明，其主要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志书编纂起指导和制约的作用。志书成书前，凡例是编纂志书的纲领和规则，有了凡例，编纂人员才能做到取材规则、编纂规则、行文规则的统一，步调一致。二是对志书读者起指导阅读的作用。志书成书后，有了凡例，对于读者来说，就等于有了可遵循的阅读指南，使读者把握志书要领，更好地阅读志书。三是为评价志书质量提供重要的依据。把不同的志书凡例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志书在编纂理念、方法和技术上的异同与优劣，从而可以窥见志书质量的优劣，是评价志书质量优劣的重要依据。

二、把握志书凡例的内容与编排

制订第三轮志书凡例，编纂人员要把握凡例的内容与编排，做到凡例内容齐备，能够涵盖整部志书，条款清晰简洁，编排有序科学。

（一）志书凡例的内容

每部志书凡例的条款设置及文字表述虽各不相同，但其内容一样，都由通例、分例、特例三个部分构成。通例，即全书的纲领、结构和所有编纂人员共同遵守的条例，如指导思想、编纂原则、记述范围、行文规范等；分例，即分门别类地说明各种体裁和各个分志的设立依据、辑录重点、记述方法等体例问题；特例，即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原则和方法。在凡例内容构成上，也有学者依据各条款功能作用，将其划分为原则性条款、技术性条款和说明性条款三类。凡

例不管怎样划分,其内容应包括指导思想、编纂原则、志书体例、志书断限、记述范围、志书内容、人物收录、行文规则、资料来源、特殊问题十个方面。

1. 指导思想。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98年2月10日印发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2008年9月16日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均明确提出编纂志书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这两个《规定》是我国志书编纂的纲领性法则,各级各类志书都要严格遵循,所以志书编纂的指导思想是编写、审定志稿需要自始至终恪守的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衡量志书质量的最基本的标准,必须放在志书凡例第一条明确交代。如江西省《浮梁县志(1994—2005)》凡例第一条:“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真实地反映浮梁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实践,突出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2. 编纂原则。志书编纂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如“立足当代,统合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等。编纂原则涉及面比较广泛,单独立条很难说清楚,因此许多志书凡例把编纂原则同其他条款结合在一起来写。一是把编纂原则与指导思想结合起来写。如江西省《南昌县志(1986—2004)》凡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则,力求反映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二是把编纂原则与志书断限结合起来写。如浙江省《象山县志》凡例:“本志统合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为1911年辛亥革命,下限至1985年,即第六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有些章节则视需要,或上溯至唐立县,或下延至1986年。”

3. 志书体例。从狭义上讲,是指志书所采用的体裁和章法。从广义上讲,凡例的大部分内容均属体例范畴。这里的志书体例仅以狭义而言,说明志书所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为主。如江西省《铅山县志》凡例:“本志采用记、志、传、录、图、表等形式编纂,以志为主体。志类分卷、章、节,按事物性质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不受现行行政管理体系限制。”同时,交代志书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述而不论,寓评于述。如河北省《邢台县志》凡例:“主要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论,寓观点于材料之中。概述采用论述体,有述有议,述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兼以纪事本末体。”

4. 志书断限。志书断限的历史年代。因为各地志书断限(上限、下限)不统一,所以志书断限必须交代清楚。创修和重修的志书,上限为事物发端;续修的志书,上限为前志下限或承接前志下限。

创修、重修、续修的志书下限断至何年，一般按照全国统一规定或本地实际情况断定。如浙江省《淳安县志》凡例：“本志通贯古今，详今略古。断限上起所志事物之发端，下限一般截至 1985 年底，大事记等个别门类的内容延至志书成稿之时。”

5. 记述范围。志书记述内容的地域范围。记述范围本应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因时间断限单列一条，这里仅指空间（地域）范围。志书凡例交代记述范围，能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空间概念。这一条款不是每部志书都有，如续修的志书断限内境域变化不大，即使不界定也不会引起疑问的地方则可以省略不写。但是，断限内有改变的地方则需交代清楚，如断限内由地区改市、县改市或改区，以及地市合并的地方就应有所交代。

6. 志书内容。介绍志书的篇目结构、内容分类、层次划分，以及某些具体篇章的主要内容或设置，包括各篇章附录、志末总附录及志尾部分入选内容的原则和编排方法。如河南省《新野县志》（1986—1995）凡例：“本志继承修志传统，坚持科学分类，兼顾社会分工，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按卷次设自然环境、建置、人口、人物、中共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人民武装、群团、政法、农业、工业、基础建设、财税金融、商业贸易、经济管理、精神文明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史志地名、艺文。述前设特载，突出重要事件及其意义。卷后设附录，

收录重要文献、资料、前志勘误，索引、本志撰稿人名单等。”

7. 人物收录。人物入志的规定。首先明确交代人物立传的基本原则、入传标准及排列方式，人物简介的收录标准及排列方式；其次交代人物表、人物名录的选录范围和排列方式；最后对以事系人的对象及做法予以说明。如安徽省《休宁县志》凡例：“人物传、表，不分人物类别，均为已故有影响的本籍人士，兼收外籍在本县有重大影响的人士，按卒年为序排列。”此条写法众多，各有千秋。

8. 行文规则。志书编纂中行文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如文字、称谓、纪年、计量、货币、地名、数据，以及其他特殊用语等。其中，人地称谓，通常交代志书记事所采用的人称，以及对人物、职官、地方、单位、机构、团体、会议、文件称谓的规范做法及其简称的使用方法；纪年方法，明确规定不同历史时期的纪年方法，以及属于纪年方面的时间概念说明；计量单位，主要明确志书对不同历史时期计量单位的使用方法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按照 1993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量和单位》执行；数字及写法，明确志书对不同数据的处理原则，凡有统计数据的均采用统计数据，无统计数据的则采用部门数据，交代各类数字的书写方法，按照 2011 年 7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GB/T15835—2011)执行。如安徽省《旌德县志》凡例:

“对历代职官、行政建置、地名等多沿用旧称,酌注现名。党、政、军等组织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多用简称。历史纪年沿用原年号,夹注公元纪年。文中‘50年代’‘80年代’等均为本世纪年代,‘解放后’则专指1949年4月至10月1日这一特定历史阶段。”

9. 资料来源。说明志书所采用资料的主要来源、出处及考订核实情况,使读者了解志书内容的准确度和权威性,以便后人查考与研究。如安徽省《祁门县志》凡例:“所取资料,来自本县旧县志、档案、图书、报刊及有关统计资料、口碑资料。对旧志撷取精华,作适当改写,录入新志;对民国时期资料作具体分析,择要记之;口碑资料经多方证实,适当录用。……各项数字一般以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准。因此,本志书所用资料不一一注明出处。”

10. 特殊问题。志书编纂中对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方法,包括有别于他志的篇目设置问题,志书涉及的重大政治问题,如何反映地方特色问题,与旧志或前志关系问题,志书记述重点问题,以及其他条款尚未包容的问题,都可单列条款说明。特殊问题是凡例中最能体现志书特色的内容,应把它视为撰写的重点,让凡例显现个性。如江西省《弋阳县志》凡例:“弋阳是革命老根据地,为了突出这一历史特点,本书专设苏区志。集中记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弋阳人民的革命斗争。”

(二) 志书凡例的编排

志书凡例的编排包括凡例在志书中的位置编排和凡例中各条款的顺序编排两个方面,均要做到有序科学。

1. 凡例在志书中的位置编排。把凡例置于志书之首,已成为编纂人员的一种共识。但凡例置于志首的什么位置,各地做法有所不同。从首轮和第二轮志书看,凡例编排方式有三种:一是把凡例置于序言之后、目录之前,按照序言、凡例、目录顺序排列,如浙江省《建德县志》、江西省《高安市志》(1986—2006)。二是把凡例置于目录、序言之后,按照目录、序言、凡例顺序排列,如江西省《婺源县志》、江西省《余干县志》(1986—2000)。三是把凡例置于序言、目录之前,按照凡例、序言、目录顺序排列,如辽宁省《建昌县志》。在首轮和第二轮志书中,凡例编排采用第一种方式颇多,第二种方式次之,第三种方式极少。因为序言与正文关系最为疏远,凡例与正文关系比较紧密,目录与正文关系最为紧密,所以凡例在志书中置于序言之后、目录之前的编排方式最为可取。

2. 凡例中各条款的顺序编排。凡例中各条款的顺序编排不是随意的,而是依据各条款的重要程度和作用大小进行排列,一般是指导思想、编纂原则、志书断限、记述范围居于前,志书内容、志书体例、人物收录列于中,特殊问题、行文规则、资料来源殿于后,即按指导

思想、编纂原则、志书断限、记述范围、志书内容、志书体例、人物收录、特殊问题、行文规则、资料来源顺序排列。

三、掌握志书凡例的制订与要求

制订第三轮志书凡例，编纂人员要掌握凡例的制订与要求，把凡例制订贯穿于志书编纂全过程，不断地修改完善，达到条理清晰、简明扼要，有虚有实、虚实结合，突出重点、体现特色的要求。

（一）志书凡例的制订

凡例在志书编纂之前就应制订，用以指导收集资料和编写初稿，做到有章可循，规范统一。凡例一经制订，并非不能更改，编纂人员在志书编纂过程中会发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产生新的认识、新的经验，应及时对凡例条款进行修改、增删，使之更加符合志书编纂实际，用以指导和规范总纂。在志稿评审之时，应将凡例一起送审，由专家学者提出修改意见。在志稿评审之后，编纂人员还要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对凡例条款构成、文字表述、排列顺序等进行全面修改，使之成为内容齐备、文字精美、排序科学的凡例。总之，凡例的制订和修改应贯穿于志书编纂全过程，只有经过不断修改，反复打磨，才能做到精益求精，经得起实践检验，更具可行性和实用性、科学性。

（二）志书凡例的要求

凡例作为志书编纂之规则，其条款不同于一般的理论性阐述，也不同于一般的技术性说明，必须像制订法规那样科学严谨。具体地说，制订志书凡例要

达到以下三个要求：

1. 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志书凡例具有纲领和法则的性质，应开门见山地对志书的内容和形式作出具有纲领性的说明，有多少问题，就列多少条款，每个条款说明一项内容，不要兼顾其他。每个条款应标明序码，可不列例名，更不必划分自然段。凡例的条款数量没有固定标准，应根据志书实际情况，以涵盖全书为原则。凡例力求文字精炼，切合实际，不要篇幅过长。

2. 有虚有实，虚实结合。制订志书凡例是编纂人员通过对方志理论的理解和认识，简洁地运用方志理论回答编纂实践中的问题，同时也是把志书编纂过程中各种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理论规则。因此，志书凡例条文应有虚有实，虚实结合，不仅要辑录内容和编纂形式作出明确规定，指出应该怎么办，而且还要说明为什么要这么办。

3. 突出重点，体现特色。每部志书的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是基本相同的，但因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各地志书的结构和方法也会有所区别，故凡例既要有某些共性内容，又要有某些个性内容。制订志书凡例，应抓住重点，突出个性，体现特色。凡历代相因且至今没有疑义的传统体例，不必详述，点到即可。凡述及全国的统一规定和各地约定俗成的某些规则，其文字也要尽量简略。需要突出本志的重点和特色，使本志纵异于旧志，横别于他志。

四、志书凡例制订应注意的问题

从首轮和第二轮志书看，有的凡例制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里仅提制订敷衍了事、内容以偏概全、特色混同一般、与正文自相矛盾四个问题，编纂人员在制订第三轮志书凡例时要引以为戒。

（一）志书凡例制订要认真，不能敷衍了事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未把制订凡例当作要务对待。如有的地方志机构对制订凡例不够重视，认为无所谓；有的在编纂过程中没有制订凡例，直到志稿编成送审时才匆忙凑上几条充数；有的不考虑本地实际，机械模仿别地凡例，比着葫芦画瓢，使凡例与志书形成两张皮。编纂人员要高度重视志书凡例制订工作，把它贯穿于志书编纂全过程，不断加以修改和完善，使之既全面又切合本地实际。

（二）志书凡例内容要齐备，不能以偏概全

志书凡例的内容残缺不全，难以涵盖整部志书。如有的志书凡例忽略了编纂宗旨、指导思想及政治标准等内容的规定，将其视为政治标签或者宣传色彩，似乎离开政治越远越好；有的志书凡例仅设几条通例，凡例内容缺漏太多，不能涵盖整部志书，满足不了修志和用志需要。编纂人员制订志书凡例要注意内

容全面，能够涵盖整部志书，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

（三）志书凡例特色要体现，不能混同一般

志书凡例没有从大的方面做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无论大小都详尽无遗地写入，未能抓住重点。如有的通例较多，特例较少，缺乏个性和特点，不能充分体现地方特色；有的把一般出版物的具体规定搬入志书凡例，条款繁琐，文字冗长，没有抓住凡例的真正要领。编纂人员制订志书凡例要抓住重点，最好把特例单设条款，体现凡例个性，不能把特例混同一般，淹没凡例的地方特色。

（四）志书凡例与正文要吻合，不能自相矛盾

志书凡例规定与正文各行其是，互相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在数据、纪年、计量等方面。如汉字和阿拉伯数字、公制和市制，简化字和繁体字、公元纪年和中国历史传统纪年的混用不清等问题。这些问题改起来难度不大，但所涉及的面广量大，稍有疏忽就被遗漏。编纂人员制订志书凡例要认真严谨，注意凡例规定与正文吻合，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

（作者单位：江西省地方志研究院）

责任编辑：熊蜀黔

浅析高质量编辑地方综合年鉴图片

刘增明 赵若璇

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具有资料性工具书和系列性史册的双重属性。近年来,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地方综合年鉴的作用日趋重要,其编纂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高质量编纂好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图片是地方综合年鉴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年鉴内容形象记载的图片刊载尤为重要,没有图片的年鉴不是完整的年鉴,没有高质量的图片也不是优质年鉴。图片使内容形象化,是对年鉴文字内容的补充,在文字占主导地位的年鉴中,图片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用好用活图片是年鉴高质量编纂和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

笔者结合自身多年从事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工作实践,从图片入鉴必要性、图片来源渠道、图片选取使用常见问题、图片选取使用应遵循的原则、如何编辑入鉴图片等五方面,谈谈如何搜集好、编辑好图片,以求同仁赐教。

一、图片入鉴的必要性

在“读图时代”,图片能起到迅速、鲜明传达信息的作用。每一位读者在阅读一本书的过程中,一般来说首先翻阅的便是图片,蕴含丰富信息量的清晰高质量的图片能迅速抓住读者眼球,增强读者的感性认识,有更好的阅读体验。年鉴中图片所占比例虽小,但却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可以直观而丰富地传达信息,是年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年鉴图片的选配关乎其质量,“先图夺人”更能够彰显年鉴特色。刊载丰富的、富有特色的图片能够体现整部年鉴的气质,展现当地发展的整体面貌。如果年鉴没有图片,年鉴的资料性将大打折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地方综合年鉴在中国大陆地区起步,年鉴编辑受排版、印刷、摄影等技术条件的限制,图片在年鉴中的运用较少,当时普遍采用的是卷首彩页加正文黑白印刷。今天,随着技术进步和审美要求的提高,年鉴已基本采用全彩印刷,大多在图文配置、色彩呼应、版式设计上下功夫。可以说图

片已成为年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增强了观赏性，提高了可读性，让读者通过文字与图片的结合对一个地区、一个学科、一个行业的真实情况有更为直观醒目的了解，起到事半功倍，相得益彰的效果。

一是图片入年鉴，能起到更好的展示作用。年鉴作为年度资料性工具书，信息量巨大。年鉴内文每个条目不可能都配有图片，而能入年鉴的图片一定是有代表性、有特色的，必然是一种突出展示、特色展示、个性展示，尤其是卷首图片有重要的展示功能，更应求精、求亮点。

二是图片入年鉴，能增加年鉴的可信度。图片使叙事和记载过程增加可信度，特别是一些建设成果、突发事件，一张真实可信的图片比千言万语来的更为直观、直接，起到对内文很好的注释作用。作为注释作用之用的图片可以弥补条目文字在表述上的不足，文字与图片在传达信息方面起到互补作用，增强“现场感”，这是年鉴可信度的重要支撑。

三是图片入年鉴，可以增强设计感，起到很好的修饰作用。作为工具书，一般很少注重年鉴的美学和艺术设计感。大量增加的图片不能简单的堆砌，需要精心设计和布局，因此需要在版式设计上下功夫。好的版式设计让整部年鉴在视觉上更加美观大方，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四是图片入年鉴，具有重要的存史

作用。重大事件的现场，重要活动、会议和庆典的场面，重要人物的活动等图片资料，能生动记录特定的历史时刻，直观展现一个地方的发展脉络和地方风貌。同时图片中的细节也常常能补充文字记述的缺失，使历史更立体，为历史研究提供真实、直观的视觉证据，辅助还原历史原貌，佐证材料的真实性。所以在特定情况下的图片，具有非常重要的存史价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图片的生命力越强。

二、图片来源渠道

年鉴编纂者要拓宽图片来源渠道，不能单一渠道收集，不仅要多方广泛收集，还要多管齐下收集。除了靠年鉴各承编单位报送外，还要积极主动与当地报社、摄影协会等单位合作。

一是向承编单位收集。年鉴所需的照片范围广泛，涵盖一地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涉及的承编部门、单位几十家甚至一百多家，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图片来源渠道，而且供稿单位所提供的图片最能反映出本区域、本行业、本单位的年度性、区域性特征。在年初下发年鉴编纂方案通知中，要求各承编单位报送文字资料的同时，报送本部门、本单位随文图片，以供年鉴编纂者选用。这是最便捷的组稿渠道，只有这样，才能把文字与图片的征集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方便又直接，使征集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如《邢台年鉴（2025）》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

室两办名义下发关于印发《〈邢台年鉴（2025）〉编纂方案》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承编单位报送稿件时，报送3~5张高质量随文图片。

二是向新闻媒体收集。年鉴编纂者要时刻关注各种新闻媒体，加强与当地报社等的联系，当地报刊都为各级党委的机关报，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能坚持正确舆论导

向。同时所刊载内容覆盖所属区域的方方面面，不仅具有权威性，区域特征也很明显，是收集新闻线索和图片最有利的一条渠道。特别是报社每天编发的报纸都有新闻时政类的图片，年鉴编辑部应及时收集所需要的图片，以备年鉴所用。如《邢台年鉴》编纂者加强与邢台日报社撰稿人联系，及时查看《邢台日报》《邢州报》，一发现报纸上刊有重大事项、重要活动就及时联

系报社收集有关图片，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收集。

三是向摄影家协会收集。年鉴编纂者要加强与摄影家协会的联系，一些反映城市建设、风景名胜、民俗风情等要求较高的图片往往需要面向摄影家协会征稿。如果多方收集来的图片不理想或有所缺失时，也可请摄影家协会帮忙，



《邢台年鉴（2024）》卷首百泉复涌专题图片

邀请摄影家专门进行补拍，以免留下遗憾，影响年鉴的系统性、全面性。如《邢台年鉴（2025）》在收集卷首“百泉复涌”专题有关泉的图片过程中，年鉴编纂者亲自上门到市摄影家协会对接，现场挑选、拷贝年鉴所需有关泉的图片。

四是依靠自身力量收集。年鉴编纂者也需要注意积累图片，一些大事发生的时候照片较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照片就越来越少，作为年鉴编纂者要有照片的敏锐性，养成随时发现随时保存的习惯，以免临时抱佛脚，措手不及。年鉴编纂者平时要多方寻找有价值的图片，利用网站、杂志等媒体，从中查找专题照片，如大型体育运动会、重要招商引资活动、重大自然灾害和各种世博会、中博会等活动图片。对一些年度大事的发生现场，可主动出击，自己拍摄，赢得主动权。作为年鉴图片编辑，只要时时留心、处处留意，可以拍摄到很精彩的图片供年鉴使用。

五是有偿付费收集。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服务系统是新华社对用户提供的新闻信息服务的总平台和总出口。数据库的内容包括新华社实时播发的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等各类新闻信息产品及各类新闻信息历史资料。使用新华社数据库各类新闻信息产品需要付费使用，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选用该收集渠道。

六是发布图片征集启示。2025年3月，邢台市档案馆（邢台市地方志办公室）

通过《邢台日报》、邢台网、“档案方志”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发布《邢台年鉴（2025）》图片征集启示，对图片征集对象、内容、要求作了明确说明和要求。启示发布后，热心的市民提供了有关图片，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图片选取使用常见问题

图片选取使用首先要注重典型性、资料性，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年度特色和发展变化的情况，应当体现重点、展示特色，在充分积累图照素材的基础上，精心筛选，把一年中最有价值、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图片编入年鉴，少上或不上内部管理、行政事务、年度例会等会议类图片；同时，应当实事求是，既客观反映年度真实情况，也不要回避年度内发生的重大失误、重大事故。阅读一些地方综合年鉴，笔者认为年鉴图片在选取使用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图片使用不合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今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要求，慎用少用领导、会议照片，慎用少用签字、奠基、剪彩等仪式照片，慎用摄影、书法、绘画等艺术图片。除英烈外，一般不使用人物标准照。但在年鉴编纂具体工作中，部分年鉴中仍使用领导视察、会议讲话等图片，而缺少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关注度。个别年鉴编纂人员甚至将个人参加的各类地方协会，如书法、摄影、雕塑等相关图片放到年鉴“附录”类目

内容中,严重违反规定要求。

二是选题编排不精细。图片取舍标准不统一,往往是撰稿人提供什么样的图片就用什么图片,或者临时用网上的截图。不少年鉴按“五位一体”布局设置图片专题,但每个专题却只有寥寥几张关联性低、缺乏代表性的图片。有的年鉴选题到位了,图片数量也不少,但编排设计差,图片质量不高,画面不清晰或杂乱不整洁,色彩搭配不当,排版死板或随意摆放。文内随文图片任性摆放,出现几十页没图、集中配图现象,该配图的条目没有配,不该配图的条目配了图,甚至有的随文图片与相关条目“相隔千里”。种种问题,致使图片的整体价值大为降低。

三是图片文字说明不规范。任何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里,历史人物和事件也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环境里活动和发生。图片只有辅以文字说明才能客观有效地传递信息。如有的图片文字说明要素不全,没有时间要素,缺少时间的信息可谓无效信息;缺少重要领导、专家学者职务信息,未标注主要人物位次;缺少摄影者或供图单位信息。有的图片说明文字不够精炼,使用空话、套话和修饰性词语,存在评论性内容。图片说明是图片资料信息的直接来源,是构建整个图片专题意义的重要成分,必须信息完整、要素齐全,文字表述精炼、简洁、明确、规范。

四是自然风景照片过多。笔者认为,

判别景物照片的年度性,关键在于其是否与人的活动有密切联系。年鉴更重要的是表达人类活动,年鉴中这些景观图片如果不能体现时代性与年度性,将年度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充分的表达出来,就应少刊载甚至不刊载,否则与志书、史书中的图片无异。如果是人民努力奋斗下对环境进行了提升改造,使环境较之前有很大的改变,或是某个项目被列为当年的专题工程,自然风景照片也可以入鉴。如单独的河流看不出有亮点,但是如果是对河流两岸的房屋建筑有所改造,是“人”的活动使自然风光变美,就可以刊载。

五是会议照片占比过大。召开会议往往是开展工作的重要一环,各种类型的会议直接反映各方面各环节的工作情况。领导进行视察、调研、召开会议,是本部门工作受到重视的体现,部门举办的各种活动也是此项工作作出成绩的体现,故在年鉴中展示会议的照片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故不能将所有会议照片拒之门外。但应当看到,体现一个领域的成果,不仅仅是召开会议。如果会议照片占比过大,各类会议图片大量重复,反映广大民众普通生活的图片就会相对减少。年鉴要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体现社会各行各业在年度内的风采,这些不是仅仅依靠会议图片就能够体现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各类照片的比例。

四、图片选取使用应遵循的原则

年鉴选取使用的图片内容要积极健康向上，与国家方针、政策、法规有抵触的图片一律不使用，坚决杜绝出现政治性的错误。严格按照《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慎用少用领导、会议照片，选取使用有典型性、资料性等图片。同时，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使用图片。因此，图片选取使用也有应遵循的原则。

一是严把意识形态关。把牢意识形态关是审查地方综合年鉴所使用照片的重中之重，要贯穿年鉴编纂的整个过程。图片选取使用也必须严把意识形态关，如果在这个方面出现问题，造成的社会影响将是巨大的，对年鉴的打击也将是毁灭性的。

二是随文图片应图文相符，以图释文，不得用与记述内容无关的照片补白。严格遵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2020年12月30日印发的《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中第三条的规定，慎用少用领导、会议照片，慎用少用签字、奠基、剪彩等仪式照片，慎用摄影、书法、绘画等艺术图片。除英烈外，一般不使用人物标准照。

三是使用的照片必须尊重作者的著作权。地方综合年鉴在使用图片时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明确标注每一张图片拍摄者姓名或供稿单位。任何渠道获得的

照片都必须署名，不能确定照片拍摄者的也应注明供图单位。这样在保护作者著作权的同时也避免因此而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四是认真遴选所使用的图片。地方综合年鉴使用的图片在一部年鉴中虽然比例不大但分量不轻，所以在遴选图片时要突出年度性、区域性、典型性和资料性，选用的照片应该能清晰反映出本行政区域在上年度发生的重大事件、取得的重要成果和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

五、如何选用、编辑入鉴图片

选用、编辑入鉴图片应为拍摄质量高、像素高的图片，而且电子图片尺寸要满足印刷要求。每张图片要有要素齐全的图片说明，整卷年鉴确保文字与图片融合协调。在具体选用、编辑入鉴图片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选择拍摄质量较高的图片。拍摄质量高主要是表现是聚焦准确和取景适当。聚焦准确，就是要求图片主体画面要清晰，不能存在对焦不实的情况。取景恰当，就是图片的主体部分要充分展示在图片中，不能过小，也不能让主体部分超出图片。另外，光线强弱、对比度等都应有所注意，虽然光线和对比度在图片后期调整时可以修正，但原始高质量的图片更能突显整体质量。

二是图片电子文件尺寸要满足印刷标准。目前，要达到较好的印刷质量，要求文件每英寸300像素左右，年鉴上印刷的图片尺寸大约是宽11.5厘米、高

7至8厘米,1英寸是2.54厘米,因此,为满足印刷质量要求,年鉴图片尺寸应至少达到1400×900像素。

三是图片要有完整、详细的说明。图片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不能非常准确表达信息。因此,图片都要附加文字说明。说明要包括时间、地点、主要人物(及其在图片的位置)、事件等要素。此外,要有摄影者或者提供人姓名(或提供单位名称);成组的图片,还要给图片编号,分别说明。

四是图片要控制数量和分布。年鉴是一种比较严肃、严谨的资料性工具书,要保证记述信息系统、完整、全面、准确。对年鉴也用“读图”来要求显然是不相宜的,不能把年鉴编得像画册一样,因此,年鉴图片的数量不宜过多,不然有喧宾夺主的嫌疑。

五是图片排版要布局合理,错落有致。整卷年鉴的图片分布尽量做到部类之间的大致平衡,避免出现有的部类图片集中,有的部类寥寥几张。除了图片在整卷年鉴分布要均衡、协调,图片与

对应的文字内容也要在同一页,做到图随文走,避免跨页断句影响阅读连贯性。所有图片的版式最好统一,不能像画册的设计那样多变,不能让图片喧宾夺主。整卷年鉴要确保文字与图片融合协调,保持整体美观性。

六、结束语

年鉴图片运用的好坏可以说是检验年鉴质量的一把尺子,要保证年鉴质量,必须严把图片质量关。选图典型,画面清晰,构图美观的图片,直接影响到年鉴的档次和品位。

因此,提高年鉴图片的综合质量,是提升年鉴存史价值和提高可读性最切实有效的途径。在年鉴编纂工作中,通过重视提升年鉴图片编纂者素质、细化工作流程、严格内容审核,不断提高年鉴质量,充分发挥年鉴作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年鉴力量。

(作者单位:邢台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陈伟

地方志里的巴文化：传承、变迁及当代价值

夏小平

巴文化是中国古代巴人及其后裔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巴文化源自古代巴国。巴国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方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巴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巴国的历史密切相关，巴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鼎盛，其文化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巴文化不仅包括了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内容，还涵盖了巴人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艺术创作等多个方面。

巴文化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在新石器时代，巴地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从考古发现来看，诸如巫山龙骨坡遗址、大溪文化遗址等，都为巴文化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实物证据。在夏商周时期，巴人逐渐形成部落联盟，并与中原王朝产生联系。巴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鼎盛，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力。秦灭巴后，巴文化虽受到中原文化的冲击，但依然在巴地民众的生活中延续传

承，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态势。巴文化历经漫长的发展变迁和历史演进，其历史脉络与族群互动在地方志文献中呈现出独特的记载逻辑与叙事视角。本文旨在以地方志为核心史料，聚焦地方志中的巴文化，通过深入挖掘地方志这一独特文献资源，解析地方志中巴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族群记忆的文本化路径，全面梳理巴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脉络，探究其内涵特征、传承变迁与当代价值，为地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一、巴文化的主要特征

巴文化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内涵。其覆盖范围大致包括今重庆全境、川东北、鄂西、湘西、黔北等地区，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巴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

巴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其独特的文化符号、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

首先，巴文化的文化符号具有鲜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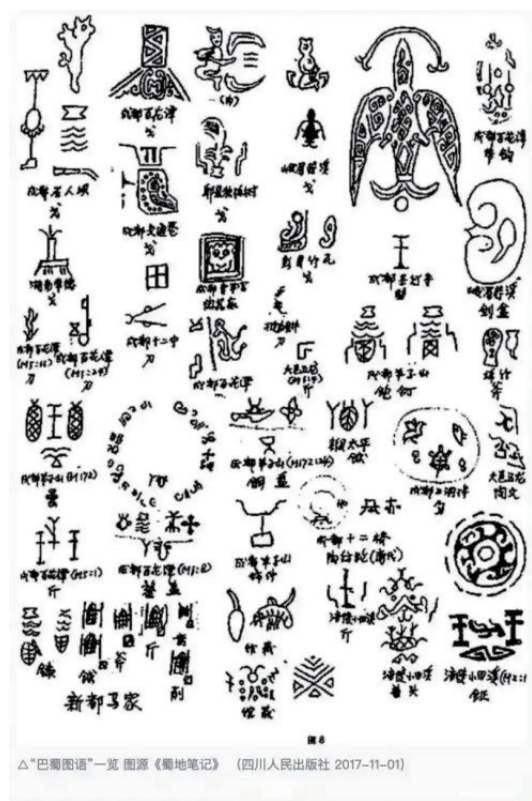


的地域特色。如巴蜀图语^①是巴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其独特的图案和符号系统反映了巴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此外，巴文化的青铜器、陶器等文物也展现了其高超的工艺水平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其次，巴文化具有丰富的物质文化。巴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在农业方面，地方志记载巴地以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为主，“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②同时，巴人还擅长种植茶叶，巴地的茶叶在古代就享有盛誉，如《华

阳国志·巴志》中就有“园有芳蒨、香茗”^③的记载。在手工业领域，巴人的制陶、青铜铸造、纺织等技艺独具特色。巴地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独特，纹饰精美，体现了巴人高超的铸造工艺。其中，柳叶形剑、巴氏戈等青铜器更是巴文化的典型代表器物。在建筑方面，巴地的吊脚楼建筑形式极具地域特色，它依山而建，临江而居，既适应了山地地形，又体现了巴人对自然环境的巧妙利用。

第三，巴文化具有显著的制度文化



①巴蜀图语又称巴蜀符号或巴蜀图形文字，是四川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的文物上发现的一些图形符号的总称。它们主要分布在铜兵器、铜乐器、铜玺印等器物上，典型的巴蜀图语有虎纹、手心纹、花蒂纹等。

②〔晋〕常璩：《华阳国志》，齐鲁书社，2010年版。

③〔晋〕常璩：《华阳国志》，齐鲁书社，2010年版。

特征。巴国在历史上曾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制度。巴国的政治体制具有部落联盟的特征，各部落之间相对独立，但又在巴王的统领下形成一个整体。在军事制度方面，巴人以勇猛善战著称，其军队编制和战术具有独特之处。如巴人善用弩，在战争中常常以弩作为主要武器，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此外，巴地还存在着独特的婚姻、家庭制度。在婚姻方面，巴人有一些与中原地区不同的习俗，如姑舅表婚等形式较为常见，这些习俗在地方志中都有零星记载，如清代《夔州府志》卷三“风俗”载：“巴人依山临水，渔猎为生，盐利尤重。”^①

第四，巴文化的精神文化丰富多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人的宗教信仰和艺术形式。“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②在宗教信仰方面，巴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巴人崇拜自然神灵，如山神、水神等，同时也崇拜祖先和英雄。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与兽骨祭器，印证了早期巴人自然崇拜与生计模式的关联性。巴人的宗教信仰与其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反映了巴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祖先的怀念。巴人信仰多神，崇拜自然神灵，如对白虎的崇拜，在巴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巴人认为白虎是祖先的化身，具有庇佑子孙的神力。

当代三峡库区考古发现的汉代“白虎纹”画像砖，与地方志所述廩君化虎传说形成物质文化佐证。在艺术形式方面，巴文化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巴人的音乐以鼓乐为主，其节奏鲜明、旋律激昂，反映了巴人豪放、热情的性格。巴地的民间歌曲也富有特色，歌词质朴，旋律优美，反映了巴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③后世将巴地的民间歌曲称为“巴曲”。唐代大诗人杜甫《社日》诗曰：“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发白狗峡》诗有云：“巴曲春全尽，巫阳雨半收。”可见巴地民间歌曲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巴人的舞蹈则以祭祀舞蹈为主，其动作粗犷、节奏强烈，展现了巴人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巴渝舞是巴人最具代表性的舞蹈形式，它气势磅礴，动作刚劲有力，最初用于战争，后逐渐演变为一种娱乐性的舞蹈。巴文化的绘画艺术主要体现在岩画和陶器图案上，其内容多与狩猎、祭祀、战争等生活场景相关，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此外，在社会结构方面，巴文化以部落制为主，部落首领拥有较高的权威，部落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形成了较为稳

① 崔邑俊修，杨崇高、焦懋熙纂〔乾隆〕《夔州府志》，清乾隆十一年（1746）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② 〔晋〕常璩：《华阳国志》，齐鲁书社，2010年版。

③ 〔战国〕宋玉：《对楚王问》，载《昭明文选》卷四十五。

定的社会结构。

二、地方志对巴文化的记载与价值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最系统、最全面、最丰富的文化瑰宝，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地方志内容博大精深，所记内容统合古今，无所不载，

“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山川水利、物产资源、典章沿革、贡赋徭役、风俗习惯、各类人物、宗教寺院、科举学校、艺文著作、武备兵防、经济生活、天灾人祸、奇闻逸事、名胜古迹等均有记载。”^①

地方志不仅记录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信息，还包含了当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人物事迹等内容。地方志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正史和其他史籍中所没有的宝贵资料，被称为“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方志文献以其特有的价值为地域文化研究呈现出独特的记载逻辑与叙事视角。

（一）记载巴文化的地方志种类与分布

记载巴文化的地方志种类繁多，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县志等。其中，以重庆、四川、湖北等地的地方志对巴文化的记载最为集中。如《重庆府志》详细记录了巴地的历史沿革、山川地理、风俗民情等内容；《夔州府志》对巴东地区的巴文化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涵盖了当地的物产、古迹、人物等方面；《恩施县志》则重点记载了鄂西地区巴文化

在当地的传承与演变。这些地方志分布广泛，为全面研究巴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

（二）地方志中巴文化记载的内容分类

地方志中对巴文化的记载内容丰富多样，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历史沿革，包括巴国的兴衰、巴地行政区划的变迁等；二是地理环境，对巴地的山川、河流、物产等自然地理信息进行记录，这些信息与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三是社会生活，地方志中对巴人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包括巴人的农业生产、手工业制造、商业贸易等方面，如记载了巴人种植水稻、茶叶等农作物；以及制作青铜器、陶器等手工艺品的情况；四是风俗民情，记载了巴人的节日、祭祀、礼仪等习俗；五是人物传记，记载了巴地的历史名人、英雄豪杰等，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体现了巴文化的内涵；六是艺文志，收录了与巴地有关的诗词、文章、碑刻等文学艺术作品，从侧面反映了巴文化的风貌。

（三）地方志对巴文化研究的独特价值

地方志对巴文化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首先，它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是当地文人、官员、学者等根据实地考察、民间传说、家族传承等方式收集整理而成，具有较高的可

^① 黄元裕：《试谈中国方志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

信度。其次，地方志的连续性记载为研究巴文化的变迁提供了可能。通过对不同时期地方志的对比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巴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例如，从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到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可以发现巴文化在风俗、语言等方面逐渐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此外，地方志还能补充其他文献资料的不足，与考古发现、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共同构建起巴文化研究的资料体系。

（四）巴文化对地方志编纂的影响

地方志中对巴文化的记载内容丰富多样，反过来，巴文化对地方志的编纂体例、内容选择和记述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巴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使得地方志的编纂体例更加灵活多样。例如，《华阳国志》在编纂体例上采用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相结合的方式，既详细记载了巴国的历史沿革，又生动描绘了巴人的生活和风俗。这种编纂体例不仅丰富了地方志的内容，也提高了地方志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其次，巴文化的内容选择对地方志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往往会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巴文化内容进行详细记载。如《巴县志》在内容选择上，重点记载了巴人的婚丧嫁娶、节庆习俗、饮食习惯等民俗风情，以及巴人的宗教

信仰、祭祀活动等宗教文化。^① 这些内容不仅反映了巴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也为研究巴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最后，巴文化的记述方式对地方志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地方志在记述巴文化时，往往采用生动形象的记述方式，以增强地方志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如《重庆府志》在记述巴人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时，采用详细的描述和生动的比喻^②，使得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巴文化的艺术魅力。

三、巴文化在地方志中的传承与变迁

巴文化作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受不同因素影响而演进变迁。

（一）不同历史时期巴文化在地方志中的呈现

古代时期：在古代时期，巴文化经历了从起源到发展的过程。地方志中记载了巴人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如巴人与楚人、蜀人等的交往，促进了巴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秦汉至唐宋：文化整合与适应性重构。地方志记载的秦汉移民政策与郡县制推行，标志着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碰撞。如《华阳国志·巴志》所述“秦

①朱之洪、向楚等纂修〔民国〕《巴县志》，重庆图书馆藏。

②王梦庚纂修〔道光〕《重庆府志》，道光二十三年（1843）刊本，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并天下，置巴郡”，反映行政建制对巴地社会组织形态的重塑。在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巴地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巴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并开始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巴人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方面逐渐发生了变化，一些巴文化的传统逐渐消失。这一时期的地方志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地在政治制度、礼仪规范等方面逐渐向中原地区靠拢。如在官员的设置和行政管理制度上，巴地开始采用与中原地区相似的模式。到了唐宋时期，巴地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文化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巴文化在与中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在不断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繁荣。在文化教育方面，巴地的书院兴起，科举制度在巴地得到推广，地方志中对文人墨客的记载增多，巴地的文学艺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反映了巴地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地方志中“巴渝舞”演变为宫廷乐舞的记载，体现巴文化元素通过官方渠道进入主流文化体系，其功能从祭祀仪式转向艺术表演，彰显文化符号的流动性。同时，巴地的民间艺术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巴渝舞”在唐宋时期已经成为宫廷和民间都喜爱的舞蹈形式。

明清时期：地方志编纂与巴文化记忆再造。明清方志编纂的制度化促使巴文化叙事趋于系统化。万历《重庆府志》将“巴蔓子刎首存城”传说纳入“忠烈”

条目，赋予历史事件以儒家伦理内涵，显示地方精英通过文本编纂重构族群记忆的意图。同时，方志中“巴人尚巫鬼”的反复记述，既延续了早期文化特质，亦暗含主流话语对边缘文化的他者化凝视。明清时期，由于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巴文化又受到了湖广等地文化的影响。地方志中记载了大量移民入川的情况，以及移民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对巴文化的冲击和融合。如在饮食文化方面，辣椒等外来作物的引入，改变了巴地原有的饮食习惯，逐渐形成了以麻辣为特色的川菜（渝菜）文化。

（二）巴文化传承变迁的影响因素

巴文化的传承变迁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政治因素对巴文化的传承与变迁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政策对巴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巴国时期，巴文化在相对独立的政治环境下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秦灭巴后，巴地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政治制度的改变使得巴文化开始与中原文化融合。在历代王朝的统治下，巴地的政治制度不断调整，这也促使巴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的互动中发生演变。经济因素是巴文化发展的基础。巴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古代巴地的盐、丹砂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和贸易，促进了巴地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随着经济的发展，巴地的城市逐渐兴起，商业活动日益频繁，这使得

巴文化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中不断吸收新的元素。社会因素如人口迁徙、民族融合等也对巴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上的多次移民运动,使得不同地区的文化在巴地汇聚,促进了巴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如湖广填四川时期,大量湖广移民进入巴地,大移民融合了情感,大移民熔铸了风物,大移民熔炼了精神,大移民荣耀了历史,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和习俗,与当地的巴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风貌。文化交流因素是促进巴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力。巴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如巴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等的交流,促进了巴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三）巴文化传承与变迁的特点与规律

巴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规律:一是地域性,巴文化的传承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它主要分布在巴人活动的区域。不同地区的巴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会受到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二是民族性,巴文化是巴民族的文化,它体现了巴民族的性格特点、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巴文化的传承与巴民族的繁衍和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三是连续性,巴文化的传承具有连续性,尽管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巴文化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但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和传

承脉络。四是多元性,巴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吸收了其他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多元性的特点。如巴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等相互交流、融合,丰富了自身的内涵。五是渐进性,巴文化的变迁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逐渐发生变化,而不是突然的、剧烈的变革。六是民间性,巴文化的传承更多地依赖于民间的家族传承、民俗活动传承、教育传承等方式,在民间社会中得到延续和发展。如巴人的手工技艺、音乐舞蹈、民间艺术等,都是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授等方式传承给晚辈并流传至今。

四、巴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

巴文化作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里的一朵绚丽奇葩,它彰显着地方特色,延续着文化命脉。它的产生、发展、演变,对塑造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征途中,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保护、传承和发展巴文化,充分激发巴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让古老的巴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新贡献。

（一）巴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

巴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首先,地方志在巴文化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志不仅是巴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研究巴文化的重要

史料来源。通过对地方志中的巴文化记载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巴文化的内涵和特征，为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其次，巴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创新应用与发展策略也值得关注。如巴文化的艺术形式可以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创造出具有巴文化特色的现代艺术作品。巴文化的民俗风情可以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开发具有巴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巴文化的宗教信仰可以与现代社会的精神需求相结合，探索巴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巴文化中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以及巴人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等，都对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重塑有着重要价值。

（二）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

巴文化是巴民族的文化，它承载着巴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通过研究和传承巴文化，可以增强巴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民族的团结和发展。巴文化作为巴地人民的精神纽带，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价值。地方志中巴人族群迁徙、姓氏分布的记载，为当代土家族、苗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的族源追溯提供文献线索。基于方志文本的跨学科研究，可消解“巴人消失论”的认知误区，强化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万历《重庆府志·人物志》

将巴蔓子事迹归类为“忠义”^①，体现儒家价值观对地方叙事的渗透。巴文化中蕴含的巴人勇敢、坚韧、团结的精神品质，是巴地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为当代重庆城市精神的再造提供精神滋养和历史支撑。通过对巴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可以增强巴地人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有助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而巴文化正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

（三）旅游开发与经济发展

巴文化丰富的内涵为旅游开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地方志文献为蓝本的文化IP开发（如“巴渝十二景”数字化再现），实现了历史文本向体验经济的转化，此类实践既需警惕文化符号的过度商业化异化，亦为地域文化传播开辟新路径。巴地的历史遗迹、民俗文化、自然风光等都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如重庆的大足石刻、合川钓鱼城等历史遗迹，以及巴渝古镇的民俗风情等，都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通过对巴人的遗址、古建筑、民俗文化等巴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可以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巴文化，扩大巴文化的影响力。

（四）文化创新与当代文化建设

巴文化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它

^① 张文耀、邹廷彦修纂[万历]《重庆府志》，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元素和创新精神，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地方志记载的巴地传统技艺（盐井开凿和崖墓营造等）、“摆手祭”等节庆仪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提供历史依据。如当代土家族“撒尔嗬”丧葬舞蹈与方志所述“巴人踏蹄”的关联性研究，印证了文化基因的历时性延续。巴文化的艺术形式、价值观念等可以与现代文化相结合，进行创新发展。如“巴渝舞”可以经过改编，成为现代舞台上的艺术表演形式，展现巴文化的独特魅力；巴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也可以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充分挖掘和利用巴文化资源，有助于推动文化创新，丰富当代文化的内涵，有助于培养当代公民的文化素养，提高公民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水平，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文化自信和国家文化软实力。

五、余论

地方志作为研究巴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为我们全面了解巴文化的内涵、传承与变迁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通过对

地方志的深入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巴文化在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的独特表现，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多种因素影响所发生的演变。巴文化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不仅是巴地人民的文化根脉，也是推动地域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在对巴文化的深入研究中，应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志中巴文化资料的挖掘和整理，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巴文化的发展规律，为巴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同时，巴文化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巴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创新巴文化传承方式，推动巴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以促进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让古老的巴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熊蜀黔

为了一次穿越百年的邂逅^①

——在尘封百年的档案中探寻游曦印记

曾向前

游曦，原名游传玉，与胡筠、赵一曼、胡兰畦并称“黄埔四女杰”，是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中第一个女英雄。据公开资料记载，游曦，1908年出生于四川巴县（今属重庆）的嘉陵江畔，曾在巴县县立女子职业学校（另说为太阳山女子职业学校）、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简称“重庆二女师”）、重庆中法大学（中法大学四川分校）读书学习；1926年，在党团组织领导下筹建成立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并主持召开有300多名妇女代表参加的大会，被选为宣传主任；1926年底，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叶剑英兼任团长）参加广州起义，担任教导团的共青团支部委员和女兵班班长；在起义中，游曦奉命率领女兵班在珠江北岸长堤阻击敌人，终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年仅19岁。“战斗打得无比顽强……子弹炮弹打光了，战士们就用刺刀拼、石头砸；刺刀断了弯了，石块光了，就抱住敌人用牙咬。”^②战斗结束后，敌人泄愤对游曦遗体进行惨无人道摧残，他们扒掉她的衣服，将她肢解成数块置于天字码头示众，后又投入珠江之中。

游曦，是革命战争年代重庆英雄儿女的杰出代表，是重庆人民永远的骄傲。她的一生如同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短暂而绚丽夺目。她的生命绝唱更是惨烈悲怆、惊世骇俗、感天动地。我似乎能感受到，在她牺牲后，一个高尚、美丽、果敢、笃定的英烈忠魂，在她生长的嘉陵江畔、在她葬身的珠江流域、在她抛洒热血的华夏大地四处游弋，为革命呐喊、为战友助威，直至迎来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晨曦……

时至今日，她的故事仍在传颂，激

①本文中所有档案信息均查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全宗（全宗号0130）。

②沈仁康：《红花岗上放红花》，《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1日。

励着我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期待一次穿越百年的邂逅

百年前，游曦生活、学习、战斗在重庆这片热土上，她留下的足印在今天是否还能找到？是斑驳依稀还是清晰可辨？作为一名档案人，基于职业习惯和个人兴趣，我对此产生极大好奇心与责任感，随即便全身心投入到重庆市档案馆馆藏中寻找答案，期待能在茫茫“档案”中与游曦来一次穿越百年的邂逅。

我翻阅《重庆市档案馆指南》^①，发现馆藏中没有她曾就读过的巴县县立女子职业学校或太阳山职业学校、重庆中法大学的相关全宗，而其他可能有关联的全宗（如民国时期重庆市教育局全宗等）又未能涵盖游曦经历年代。但是，我发现，馆藏中保存有“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全宗，而这个“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就是游曦曾经就读过的重庆二女师，并且，该全宗时间跨度上溯至1914年，完全涵盖游曦在该校的读书经历年代。在现有馆藏中能够找到与游曦经历相关联且形成时间上溯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档案全宗确属十分少见，这是机缘巧合，还是天

意眷顾？

我急切地踏进重庆二女师尘封百年的档案秘境，发现其中保存有不少有关师范班和附属高中班、初中班、高小班的学生一览表、毕业生表、试验分数表、住校生表等，而且相关班级学生的年龄、籍贯、入校时间、考试成绩、住校日期等都有记载，虽然有些字迹潦草不好辨认，有些整理混乱前后无序，但材料林林总总，内容较为详实，这不禁让我兴奋，似乎与游曦的邂逅已近在咫尺。

有关游曦在校经历的公开记述扑朔迷离

由于当时重庆二女师所设班级繁杂、学生数量众多，若不掌握确切线索，将会耗时费力、事倍功半。于是，我广泛搜寻有关游曦的记述文章，特别是查找最初或较早形成的相关记述，幸运的是，通过相关文献数据平台找到了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数篇文献资料，主要有陈德芸于1979年7月所撰写《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游曦烈士》^②，陈德芸于1982年12月所撰写《赵一曼烈士在武汉》^③，丁秀君于1984年3月所撰写《富于革命精神的重庆女子师范学校》^④，黎显衡于1982年所撰写

①郑永明、唐润明主编《重庆市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2010年2月。

②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1月。

③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4辑，总第14辑）》，1983年11月。

④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

《戎马英姿——记游曦烈士》^①，黎显衡、阚孔璧于1983年所撰写《青春如火 浩气长存——游曦烈士传略》^②，曾维钦于1987年所撰写《用青春和生命捍卫革命事业的巾帼英雄——游曦烈士传略》^③以及《南粤英烈传》^④《中华英烈词典》^⑤《中华英烈辞典》^⑥等。除此之外，在知网等网络平台上还找到一些涉及游曦经历的文章，如李元林的《长征女英雄第一步——献给长征胜利70周年和李伯钊诞生75周年》^⑦、陈德芸的《回忆与赵一曼一起在武汉军校的日子里》^⑧、上游新闻的《重庆珍档 | 黄埔军校“四大女杰”之一是重庆妹子 还是妇女运动先驱》^⑨，等。当然，通过“deep seek”“豆包”等AI工具以及今日头条、抖音等，也能搜出有关游曦的大量讯息。

通览之后，我发现相关文章或资讯五花八门，表述不一，冲突甚多。一是关于游曦的入学经过。有的说是经童庸生介绍入学的，有的说是经童庸生介绍、与童庸生妹妹童毓英一起入学的，有的

完全没有提及此事。二是关于游曦的入校时间。有的说是1922年秋，有的说是1923年夏，还有的说是1924年。三是关于游曦在校时所用名字。有的说在入校前已改名为游曦，有的说在校时叫游传玉，之后才改名游曦（后又改名游牺），还有的说在校时叫游素华。四是关于游曦的就读班级。有的明确说是师范第9班，有的说是师范第10班，有的没有具体提及。五是关于游曦被开除的情形。有的明确说是因为“驱黄运动”（驱逐反动校长黄尚毅）被开除，有的说是因为参加爱国运动被开除，有的完全没有提及此事。尽管相关记述扑朔迷离，但终归给我查找档案提供了一些重要提示和线索。

重点关注陈德芸与丁秀君的相关记述

陈德芸、丁秀君是与游曦同时代的人，都有着就读重庆二女师的共同经历。陈德芸与游曦同批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

①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工作室：《广东女英烈传（第二辑）》，1982年。

②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四川党史人物传编辑组：《四川革命烈士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83年。

③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党史人物第一集（1925—1927）》，重庆出版社出版，1987年3月。

④广东省党史办：《南粤英烈传》，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

⑤张海赴、佟佳凡、公方彬主编《中华英烈词典》，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1991年。

⑥陈日朋：《中华英烈辞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1991年6月。

⑦李元林：《长征女英雄第一步——献给长征胜利70周年和李伯钊诞生75周年》，《红岩春秋》2006年第5期。

⑧陈德芸：《回忆与赵一曼一起在武汉军校的日子里》，《湖北文史》2007年第2期。

⑨纪文伶撰文，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史料和照片，《重庆珍档 | 黄埔军校“四大女杰”之一是重庆妹子 还是妇女运动先驱》，上游新闻2021年4月19日。

校第6期，她涉及游曦的相关回忆文章就是口述史资料，可以作为档案史料的有益补充，具有重要的参考和佐证价值。丁秀君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担任过母校（当时更名为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数年校长，她的《富于革命精神的重庆女子师范学校》一文应该是她在查阅和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上拟就的，具有一定的史实性和可信度。

陈德芸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游曦烈士》中写到，“游曦烈士，四川巴县人，原名游传玉，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生于巴县大阳沟祖庙街，父名游正华，母亲姓吴，全家以代人织造毛巾土布维持生活，一九二二年游曦考上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第九班读书（省立第一女子师范设在成都），改名游曦。此时女二师校长杨漱溟是国家主义派，……因当时重庆一些青年男女学生都喜欢看肖楚女所主编的《新蜀报》文章，接受了一些革命启示，因此很痛恨国家主义派，游曦与同学们发起‘打狗运动’，杨漱溟被同学们（由游曦带头）用‘响竿’、扫帚赶出了校门……”“我与游曦是同班同学，同教室、同寝室，朝夕相见，情谊深厚；一九二五年她介绍我加入‘共青团’，党团指示，俱由游曦传达（即所谓单线联系）”。陈德芸在《赵一曼烈士在武汉》中写到，“1922年我与游曦（重庆市人，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女英雄）同时考入重庆女二师读书。我在师十班，游曦在师九班。我们两人同一寝室、朝

夕相处，情谊深厚”，还提到“我家住涪陵”“我原名陈德馨”。陈德芸在《回忆与赵一曼一起在武汉军校的日子里》一文中再次写到“我在师10班，游曦在师9班”。

丁秀君在《富于革命精神的重庆女子师范学校》中写到，“女师学生离校工作，大多能以校训作为生活准则，坚定做正人，做好事。个别优异同学，更本此准则，在革命征途中，创造出不朽业绩。如师九班的游素华（后名游曦），参加了党组织，后在广州起义中英勇战斗，光荣牺牲。师五班的雷兴政（现任南充政协委员），师六班的李承萱（后名李伯钊），中一班的廖竹君（后名廖苏华）、陈志筠、程德馨（后名程仲苍），师八班的郎明钦、缪云淑和中二班的童幼芝等，都是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从以上记述中得出有关游曦的关键信息是，游曦在校时或名游素华，就读师范第9班。

在师范第9班中寻找游曦

通过定向搜寻，我陆续找到呈现有师范第9班学生名单的材料共五份，分别是该校《师范第九班学生一览表（第一号）》（未明确制表时间，根据前后文推测应为1925年前后）、《师范第九班学生一览表（第二号）》（未明确制表时间，根据内容推测应为1926年8月之后）、《1924年度下学期总积分册》、《师

中各级学生考试积分表》(1925年秋季)、《各级学生试验成绩册》(1926年上半年)。其中,《师范第九班学生一览表(第一号)》呈现该班学生共有67名,全是1924年8月入校,说明师范第9班是1924年8月开班的;《师范第九班学生一览表(第二号)》呈现后续中途转入该班的学生共有5名,最晚转入该班的是1926年8月。我逐一查看上述表册中的所有名字,不敢漏掉一个,结果没有看到“游曦”“游传玉”“游素华”的出现,我心有不甘又反复查看,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不过,我倒是发现一位且是仅有的一位姓“游”的学生,她叫游贤书,籍贯巴县,在“本校附属高小修业三学年五学期”后于1924年8月考入师范第9班。于是,我重点追踪了游贤书,但最终还是将她排除了,原因是:(一)在她1922年7月18日提交的入学保证书、志愿书中显示,她当年才10岁,由江苏吴县籍的“住宋□子”的颜道生担保;(二)在学校1929年秋季编制的《前期师范、初级中学学期试验成绩册》中显示,她当时还在校,每门学科都有成绩。这显然不是我要找的游曦。

此外,在师范第9班学生名单中,我发现了童幼芝,她是与游曦、陈德芸同批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的。在《师范第九班学生一览表(第一号)》中显示,她籍贯巴县,在“本校附属高小修业二学年四学期”后,于1924年8

月考入师范第9班(这与丁秀君文章所述“中二班的童幼芝”有些出入)。在《1924年度下学期总积分册》中显示她在师范第9班,但在1925年秋季制的《师中各级学生考试积分表》中显示她已不在该班。另据一份履历调查表显示,她当时的住址(通讯处)是“弹子石横街尾葡萄院”。

陈德芸与丁秀君这两位重要“当事人”提供的重要线索未能让我找到游曦,这不由得使我对她俩的在校经历产生好奇。

在师范第10班中找到陈德芸

陈德芸自称在校时就读“师10班”,“原名陈德馨”,“家住涪陵”。我在档案中找到该校《师范第十班学生一览表(第一号)》,表中显示所有学生皆是1926年8月入校、所学门类为“初级师范”,其中没有“陈德馨”,但有“陈德心”,籍贯涪陵县,之前在“涪陵明德女校(修业)四学期”。另在该校1926年秋季制的《师中各级学生考试积分表》中显示,陈德心在师范第10班,在5门学科9次考试中她只有4次考试成绩的记录(或许已在备考黄埔军校)。这位陈德心应该就是“原名陈德馨”的陈德芸。陈德芸从1926年8月入校到年底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只有不到5个月时间,跟当时已经转到重庆中法大学学习的游曦应该没有在重庆二女师的同

校经历（当然并不排除二人有着其他联系的可能）。

从档案显示内容看，陈德芸相关回忆是有些偏离史实的。“师9班”是1924年8月开班，“师10班”是1926年8月开班，而且，陈德芸入读“师10班”之前是在涪陵读书，所以游曦与陈德芸不可能是1922年秋同时入校的。再有，陈德芸回忆中提到1922年“女二师校长杨漱溟”是有误的，1922年当时的校长是蒙裁成，而“杨漱溟”校长是不存在的，在历任校长中只有一位杨姓校长杨叔明，正好在1926年期间任职，这似乎也反证了陈德芸1926年在校的短暂经历。

在师范第10班中，我发现了曹泽芝（后名曹诚），她是与游曦、陈德芸、童幼芝同批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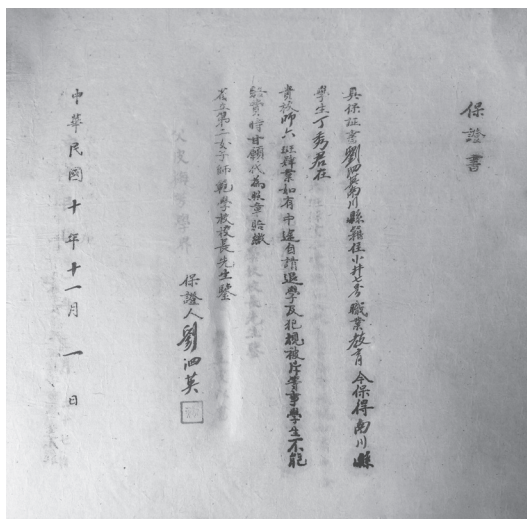
期的。在《师范第十班学生一览表（第一号）》中显示，曹泽芝籍贯江津县，之前“江津县立女子小学校高级毕业”，与“陈德心”同时入读师范第10班；在学校1926年秋季制的《师中各级学生考试积分表》中显示，曹泽芝在5门学科9次考试中没有1次考试成绩记录，她与“陈德心”的考试记录在全班学生中显得格格外特别。

陈德芸曾在最初回忆中称“我与游曦是同班同学，同教室、同寝室”，我想，是不是老人记忆恍惚了，她可能说的是与曹泽芝同班、同教室、同寝室。毕竟要让一位老人回忆清楚过去近60年的往事是不容易的，出现记忆模糊或偏差也是正常的。

其实，曹泽芝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和赵一曼同志在黄埔军校女生队》^①，其中也提到游曦，但只字未提她与游曦在重庆二女师的读书经历。

在相关班级中找到丁秀君和其他同学

丁秀君在其文章中没有自述读书经历，但通过深入搜寻，我找到她的踪迹：在1921年11月1日，南川县籍、“住小井七号”的刘泗英为丁秀君出具入学保证书，称“今保得南川县学生丁秀君在贵校师六班肄业，如有中途自请退学及犯规被斥等事，学生不能赔费时甘愿



刘泗英为丁秀君出具的入学保证书

^①宜宾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四川省妇联宜宾地区办事处：《抗日英雄赵一曼》，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

代为照章赔缴”；在该校《师范第六班学生一览表（第一号）》中显示，籍贯南川县的丁秀君在“南川县立女子高小毕业”后于1921年8月考入师范第6班；在该校《附设中学第一班学生一览表（第二号）》中显示，丁秀君于1921年8月由“本校师六班转入”附设中学第1班，说明她并未真正就读师范第6班，而是入校编入师范第6班后又旋即转入中学部学习；在该校《附设高中一班学生一览表》中显示，丁秀君在“本校初中一班毕业”后，于1924年8月考入该校附设高中1班，“肄习文科”。从其在经历看，她与游曦完全存在时空交集的可能，应该是同时在校的校友同学。

在搜寻丁秀君在校经历过程中，我还发现了李承萱、廖竹君、程志筠、程德馨、邓友兰（后名邓季惺）、王履冰的存在。她们与丁秀君是同期考入师范第6班的；在转入附设中学第1班时，李承萱没有转班而是继续留在师范第6班；其他5位与丁秀君同时转入附设中学（初中）第1班，毕业后又同时入读附设高中第1班；在高中时分科不分班，丁秀君、邓友兰、程德馨、王履冰读文科，廖竹君、程志筠读理科。相关档案信息显示如下：李承萱，籍贯江北县，之前在“本校附属高小修业二年”，在1921年由李文樞出具入学保证书，当时住所为“江北模范校对门住”，通讯地点是“川东邮政局李文樞收”。廖竹君，籍贯内江县，出生地“内江小东街”，曾住“内

江华陀街”，通讯地点是“内江大南街义泰祥交”，之前“内江县女子高等小学校第一班修业五学期”，因1921年“全眷迁渝”考入该校，由“住段牌坊”的正心诚出具入学保证书。程志筠，籍贯湖北黄安县，考入该校前“家塾肄业”，由“巴县籍、住九块桥”的仇元亮出具入学保证书。程德馨，档案中偶见写成“陈德馨”（我曾将她与自称“原名陈德馨”的陈德芸混淆），籍贯成都，在“巴县三里公立女子高小校修业五学期”后

四川省 <u>蔭</u> 文子師範學校附設中學第一班學生一覽表第二號									
姓	名	年	歲	籍	貫	入校年月	編入何學級	所學門類	前在何處
鄧	昭	勤	十四	江津	十年八月	中學			本校師六班轉入
丁	秀	君	十六	南川	同	中學			同前
余	筱	靈	十四	巴縣	同	同前			同前
周	定	芳	十六	巴縣	同	同前			同前
王	悟	君	十五	巴縣	同	同前			同前
諸	有	倫	十五	江津	同	同前			同前
廖	竹	君	十八	內江	同	同前			同前
萬	宗	玲	十四	永川	同	同前			同前
鄧	友	蘭	十六	奉節	同	同前			同前
楊	仲	夷	十五	廣東	同	同前			同前

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中学第一
班学生一览表(此为第1页,其中有丁秀君、
廖竹君、邓友兰)

考入该校，由湖北籍“住马蹄街”的程咏康出具入学保证书。邓友兰，籍贯奉节县，考入该校前“家塾肄业”，由“住巴县”的吴英三出具入学保证书。王履冰，籍贯巴县，在“江北县立女子高小校毕业”后考入该校，由巴县籍“住江北”的王民心出具入学保证书。

另外，根据丁秀君文章记述，我还找到了雷兴政（又名雷晓晖）、郎明钦、缪云淑。相关档案显示信息如下：雷兴政，籍贯安岳县，在“安岳县立女校修业二年”后入读成都的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中途转学到重庆二女师范第5班，为住校生，因转学到校前没有住校记录而被注明“该生于民国十一年八月转入本校本班”。在校期间，曾申请赴京求学“贷费补助”，校长蒙公甫专门呈请四川省长公署转饬安岳县劝学所办理，在呈文中称“该女生性质纯良、成绩优美”，“求学志趣尤属可嘉”。郎明钦，档案中偶见写成“郎明清”，籍贯石柱县，在“石柱县立毓英女校高小毕业”后，于1922年9月考入师范第7班（这与丁秀君文章所述“师八班的郎明钦”有些出入）。缪云淑，档案中存在“缪荣淑”与“缪云淑”混用情况，籍贯巴县，在“本校附属高小修业二年”后，于1923年9月考入师范第8班。

至此，丁秀君文章中所提及的几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除游曦之外，

我均已找到。此外，丁秀君文章中还提到其他几位“女师20年代培养出来的学生”钟复光、罗玉君、李鸿明等，在档案中也均有体现。她们当中，目前能够搜到写过回忆文章或留下口述史资料的有钟复光、李承萱、雷兴政等，但遗憾的是，都未提及游曦在重庆二女师的读书经历。其中，钟复光在《黄埔军校女生队的一段回忆》^①里还两次提到游曦。

没有找到萧楚女和童毓英 但找到张闻天和相关人等

黎显衡、阚孔璧在《青春如火 浩气长存——游曦烈士传略》一文中写到，“一九二四年，在童庸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游曦和童毓英一起，考入了重庆女二师读书，直接受到肖楚女的教育……”曾维钦在《用青春和生命捍卫革命事业的巾帼英雄——游曦烈士传略》一文中写到，“童庸生很赏识富于反抗精神的游曦，热情支持游曦和妹妹童毓英深造。1923年夏天，经童庸生介绍，她们进了省立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3年夏天，萧楚女到二女师任教，游曦这时才满十五周岁，几乎与她崇敬的老师同时入校”。那么，在档案中能否找到萧楚女和童毓英呢？

如果在档案中能够找到萧楚女（又名萧树烈、萧秋），那将是馆藏红色珍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总第133辑）》，1999年5月。

档的重大发现。我不敢懈怠，反复仔细查看学校教职员或教员一览表（包括教职员欠薪一览表），最终未能找到他。不过，幸运的是，我找到了张闻天。档案显示：张闻天，籍贯江苏上海县，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讲授英文与国文，每周授课12小时，每月薪俸80元，1924年11月到校。此外，还有廖划平（廖竹君哥哥），籍贯内江，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曾任顺庆联合中学校长、西南公学校务主任兼公民等科教员，讲授国文兼社会学科，每月薪俸80元，1924年8月到校，为专聘教员；还有蒋锡昌（张闻天旧友，是他挽留张闻天在重庆任教），籍贯江苏无锡，南京东南大学文学士毕业，曾任厦门集美师范国文教员，讲授国文，每月薪俸96元，1924年8月到校，为专聘教员。当时还有不少教员在历史上比较知名，如邓劭刚、周敦琬、杨效春、赖以庄、温嗣瑛、沈宗元、刘泗英、杨庆翔、周文郁、伍应奎、唐铁风、王衍康、彭云生、文伯鲁、韩文畦、李鸿明、穆济波、万从木、陈厚庵、邓少琴、余沛华、杨公托、胡坤陞等，在档案中皆有所体现。

我又搜寻了童毓英，通过对有关学生表册反复查看，最终也未能找到，其中，有几位童姓学生，基本都来自南川，跟童庸生是巴县人的历史信息

不相吻合。

在驱黄运动相关记载里没有发现游曦

李元林在《长征女英雄第一步——献给长征胜利70周年和李伯钊诞生75周年》中写到，“她们公布了罢课宣言，列举了黄尚毅办学之种种劣迹，个人思想人格之陈腐卑污。黄尚毅恼羞成怒，对学生大加挞伐，一次就挂牌开除李伯钊、廖苏华、游曦、杨义君等19名学生”。上游新闻所载《黄埔军校“四大女杰”之一是重庆妹子 还是妇女运动先驱》写到，“这年（指1925年）秋天，四川省教育厅撤换了进步校长蒙才成，派了黄尚毅来当校长。黄一到任就排挤进步教员，开除进步学生，限制学生参加进步

姓名	籍贯	学历	任职	薪俸	备注
张闻天	江苏上海县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	英文、国文	80元	1924年11月到校
廖划平	内江	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	国文、社会学科	80元	1924年8月到校
蒋锡昌	江苏无锡	南京东南大学文学士毕业	国文	96元	1924年8月到校
邓劭刚					
周敦琬					
杨效春					
赖以庄					
温嗣瑛					
沈宗元					
刘泗英					
杨庆翔					
周文郁					
伍应奎					
唐铁风					
王衍康					
彭云生					
文伯鲁					
韩文畦					
李鸿明					
穆济波					
万从木					
陈厚庵					
邓少琴					
余沛华					
杨公托					
胡坤陞					

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职员一览表（此为第3页，其中有张闻天）

活动。黄尚毅把游曦等二十五名学生开除……”那么，游曦是因“驱黄运动”而被开除的吗？在档案中能否找到当年“驱黄运动”的相关记载？

通过搜寻，我找到当年学校与四川省教育厅围绕驱黄运动展开调查处理所形成的相关材料，可以窥见整个事件的始末经过，其主要情形如下：“该校多数学生对于该校校长（指校长黄尚毅）办事有所不满”，“突于十四日（指1925年10月14日）有学生缪荣淑……等在外擅发传单，午后冲入校长室捣毁什物，抛掷门外”。“黄校长查出主使肇事及出手抛掷什物行李学生缪荣淑、陈玉琴等二十五人”，于十七日“悬牌斥退”。“牌悬后黄校长因事出校，该缪荣淑等敢将牌告打毁并轮流把守校门不许校长回校”。当时“悬牌斥退”的25名学生是缪荣淑、夏琳、陈玉琴、吴碧华、李承萱、汪鸣鸾、廖竹君、王履冰、傅敏慧、颜正璧、胥秀君、徐璟、潘秉贞、骆朝惠、胡鹤群、杨丽君、杨玲、童幼芝、杨琴熙、宋葆芬、郎明钦、卢云峰、邓昭俭、邓昭定、邓敬贤。之后，因相关情形排除1名、免于斥退5名。再之后，又根据学生一贯表现、参与情节、认错态度进行分别调查处理，在1926年初，由四川省长兼领教育厅厅长赖心辉下达指令作出最后处理，颜正璧、胥秀君、徐璟、潘秉贞、杨玲、杨琴熙、宋葆芬、

郎明钦、邓昭俭、邓敬贤10人“姑准从宽，暂免斥退，留校肄业，以观后效”，缪荣淑、李承萱、廖竹君、王履冰、杨丽君、童幼芝、卢云峰、夏琳、陈玉琴9人予以斥退离校。此后，在1926年9月，学校又以“实属不堪造就”为由斥退胥秀君、吴碧华。被斥退离校的学生，在学校后续拟制的成绩表、毕业生表、同学录中已不见她们的名字。

从档案显示内容看，在整个“驱黄运动”及其后续处理过程中，皆未能见到游曦的出现。那么，游曦是怎样被开除的呢？我通过关键词搜索，查看学校中有关“斥退”“退学”“赔费”等情形档案，还是未能发现游曦踪影。

对于当年重庆二女师的“驱黄运动”是否有中共党团组织的介入，从后来公开的一份党的档案文献^①中可以得出答案：在1926年4月15日中共重庆党、团地方执行委员会为消除杨洵、童庸生误会召开的批评会上，时任中共重庆地委委员、学生委员会书记的杨洵在谈“女师学潮事”时说到，“当时我问群众力量只有四十余人，因恐大众右倾，故主张停止。后庸生云非力争不可，不容纳我的意见”；时任中共重庆地委委员、重庆团地委书记的童庸生在谈“女师事”时说到，“事前就有种种关系。因划平同志在该校时，那般反动派对于爱活动的学生早就要想开除的，即使不闹学潮，

^①《中共重庆党、团地方执行委员会为消除杨洵、童庸生误会召开的批评会记录》，《党的文献》2017年第2期。

他们几位也在学校佔（站）不住的，加以学潮发动后我们的同志不努力去参加，必失去许多的信仰，并不是故意在闹学潮。因女师驱黄我们就不主使，他们也要干的”。

文尾我想说的话

档案中没有找到相关人和事，不等于这人、这事就不存在。百年之前，重庆二女师档案材料初始收存本身就多有残缺，很可能恰巧缺失了相关档案。再有，我没有找到不等于别人就肯定找不到，我难免会有疏漏。还有，在重庆市档案馆中没有找到，不等于别的档案馆、博物馆等文史机构就没有，例如，在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四川省政府秘书处”全宗中，就可能保存有当年学校呈报四川省长公署、四川省长兼领教育厅厅长的相关材料。此外，还不排除其他两种可能性，（一）当年游曦在校时不是正式生而是旁听生（在档案中偶见有显示“旁听生”的情况），因为不是正式在册，也未在上级机构登记备案，所以学校在拟制和呈报的相关文书、表册中就很可能不会出现她的名字，包括类似被斥退的情形；（二）当年游曦在校时是正式生（转学生或插班生也会登记造册），但是，当时学校形成的相关学生表册大多是事后（有的延后数年）才编造补报的，对于前期已经退学或被开除的学生一般不再编报在册，游曦也

有可能因此被漏掉了。

在探寻游曦档案印记的过程中，虽尚未能找到游曦，但却有不少新的发现和收获，特别是一些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在尘封百年的档案里得以显现，并在本文中予以“集体亮相”，这是非常难得的。其中不少人物通过公开资讯都能查到相关信息（有的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中也有记载），因此，文中对除游曦外的其他人物均未作生平介绍和背景交代，人物布局和排名也未按照地位或功过刻意安排（不分先后）。由于所涉年代久远，相关历史人物能够留存下来的原始档案材料十分稀缺，尤显珍贵，所以，本文在记述相关档案信息时不吝篇幅文字，略显繁复冗长。对于文中提及的相关记述文章（包括回忆文章）某些细节部分与档案记载有些出入，这是历史求证过程中的常有现象，无需责全求备。

最后，我想跟游曦说，我穿越百年，踏进校园，苦苦探寻，明明已经离您很近了，明明已经感受到了您的气息，却始终看不见您真切的身影，始终捕捉不到与您直面对视的眼神。能给我一个明朗的回应与提示吗？

百年过隙，千古流芳，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作者单位：市档案馆）

责任编辑：陈伟

抗战烽火中的万盛担当

费国容

在大娄山的褶皱山峦间，万盛犹如一枚青铜印章，深深镌刻着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铁血记忆。这座因煤而兴的山城，以乌金淬炼的筋骨、溶洞轰鸣的机床、古道蜿蜒的血脉，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用万吨焦煤、百架战鹰、千里运输线，构筑起陪都重庆的南部屏障。

一、能源动脉：南桐煤海托起抗战脊梁

1938年，日本侵略者兵临华中重镇武汉，国民政府计划在重庆构建从钢铁到武器的国防工业体系。钢铁作为战时工业的基础，其生产离不开铁矿与煤炭资源，然而，抗战后方面面临着能源及原料匮乏的巨大困境。

南桐煤田的勘探与开发，成为扭转战时能源困境的关键。

为解决抗战后方钢铁企业能源问题，常隆庆、潘钟祥、李春昱、彭国庆等早期地质工作者历经艰辛踏勘，在万盛发现了储量超亿吨的



1941年的南桐煤矿四分厂谷口河炼焦厂

优质焦煤资源。以侯德均、崔桐、张伯平等为首的南桐煤矿首创者们，于1938年10月开始筹建南桐煤矿。1939年5月，因抗战用煤告急，南桐煤矿筹备处收购地方小煤窑，经改造后即出煤，缓解了燃眉之急。随后，不断增设矿井，实现规模化开采，煤炭产量从1939年的5000吨，到1942年跃升至12万吨，南桐煤矿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敌占区除外）最大的煤炭工业基地，推动了重庆战时工业体系的形成，赢得了“抗战煤都”的称号。

与此同时，在著名实业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入股支持下，实业家刘泗英联合康心之等集资兴办东林煤矿。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至抗战胜利，仅南桐、东林两矿就生产原煤78.53万吨、焦煤24.20万吨，保障了战时陪都重庆的兵工、钢铁、电力等工业和民用供应，有力支援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



海孔洞诞生的中国第一架军用运输机“中运1”号

抗日战争的需求还促进了洗煤工艺在万盛的大发展。洗煤工艺使粗糙混杂的原煤经过破碎筛分，严格排除矸石、中煤及有害的硫元素，解决了高硫钢易脆裂的问题。万盛产出的冶炼精煤在抗战后方独树一帜，成为优质品牌，被誉为“抗战煤”。抗战期间，万盛地区产出的50万吨优质冶金焦炭全部进入重钢，按正常焦钢比计算，重钢据此生产了近40万吨钢铁，这些钢铁制造的武器，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溶洞惊雷：海孔秘境的航空奇迹

万盛经开区丛林镇海孔洞为天然溶洞，周围山势起伏，地势险要，内部宽敞，隐蔽性极佳。抗战期间，因其隐蔽的地理位置，成为一个理想的飞机制造地点，其周围严密的防御工事，有效地保护了工厂和制造出的飞机。

1938年初，为躲避日机轰炸，国民政府决定将位于江西南昌的中意南昌飞机制造厂内迁。经周密勘察，该厂迁至海孔洞，更名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简称第二飞机制造厂，又名海孔飞机厂。

当时，海孔飞机厂聚集了一批如林同骅、顾光复等全国航空技术专家，他们带领1200名技工，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下，设计出了60余架飞机。其中



海孔洞全景

包括仿苏 E-16 式驱逐机的“忠-28 甲”式战斗教练机 33 架、仿制 H-17 中级滑翔机 30 架、初级滑翔机 6 架，以及“中运 1”式双发中型和“中运 2”式双发中型运输机。特别是“中运 1”号，这是我国历史上自行研制的第一架中型运输机，于 1944 年成功试飞。这些飞机的制造不仅支援了当时抗战的需求，还培养和锻炼了一批航空技术人才，为中国航空工业的长远发展储备了力量。

三、天堑通途：立体交通网的战时突围

（一）川湘动脉：用血肉筑就的抗战生命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加强西南地区交通建设、做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准备，决定修筑川湘公路。该公路从綦江雷神店珠滩起，经万盛、南川、涪陵、彭水、黔江、酉阳、秀山至湖南沅陵县三角坪，全长 858 公里。

1936 年，川湘公路綦江雷神店至湖南沅陵县三角坪段动工修建，其中万盛段长 26 公里，为泥结碎石路面，宽 6 米，是万盛境内公路主干道，是年 10 月底，万盛段完工。筑路期间，广大民众义务修筑，在綦江到万盛的蒲河乡场边、二郎峡口等险要地段，筑路工人不畏艰险、流血流汗，最终让公路贯通。

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切断了重庆经长江水道与华东地区的交通线，川湘公路成为抗战大后方与前线联系的交通干道。不少中国军队从重庆经此路开赴前线，部分军队撤退时也经此路回到大后方。同时，南桐煤矿位于川湘公路旁，修建时的材料运输及建成后部分煤焦的运输均依赖该公路。从 1938 年开始，西南运输处沿川黔、川湘等线运输军工器材、航空燃油等军事物资。据统计，1938 年至次年 7 月，川湘公路货运量 9778 吨；1939 年 8—12 月，

经川湘公路抢运湘西入川的钨锑、大米等物资近 2000 吨；1941 年，川湘公路共运送货物 19152 吨。1940—1942 年间，因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被封锁，川湘公路承担 70% 的国际援华物资转运任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输血管”。作为川湘公路上的关键站点，万盛站承担了物资的集散、装卸和转运工作，保障了前线物资供应，同时也有力促进了万盛经济社会发展。

（二）轨痕千秋：木轨斗车的煤运史诗

为解决煤炭运输瓶颈，1939 年 1 月，南桐煤矿开工修筑王家坝至蒲河杨柳湾的轻便铁道，全长 17.27 公里，1940 年 6 月竣工，该铁道是万盛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因当时缺钢轨，除拐弯处铺设钢轨外，其余路段初用青枫木代替，1940 年 10 月更换为钢轨。1943 年，南桐煤矿修建蒲河鲁峡洞至三江段的轻便铁路，长 10.07 公里，1949 年 3 月建成。王三线轻便铁路未使用蒸汽机车，仅使用南桐煤矿自制的 250 部装载 500 ~ 1000 公斤的木斗车，全由人力推动，日运输量约 130 吨。抗战期间，南桐煤矿生产的煤焦通过轻便铁路运至三江装船外运，大大提高了煤炭运输效率。

（三）舟楫争流：孝子河上的战时航道

抗战时期，为解决煤炭运输问题，官方除修建轻便铁路外，还对綦江、蒲河的航道进行整治。为提高运力，整治

綦江河滩险 27 处，修建 5 座船闸，年运输量从 3 万吨增至 15 万吨，保障了战时物资通道畅通。孝子河是长江二级支流，其航运主要指从万盛场周家滩码头到蒲河鲁峡洞码头一段，全长 20 余公里，是当时重要的水运通道。南桐、东林煤矿以及周边小煤窑的煤，均通过孝子河运至蒲河鲁峡洞，所有货物在此卸货，再用人力转运至下游杨柳湾上较大的船，运往重庆。1939 年 7 月 15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到蒲河大仁闸坝（大场滩）视察。其后，国民党要员陈果夫、翁文灏等人纷纷前来视察南桐煤矿运输情况。最繁忙时，孝子河有船 300 多艘，下游蒲河船只更多，呈现出“白天千帆竞发，夜晚灯火通明”的壮观景象。

四、众志成城：万千民众的抗战情怀

抗战时期，全国民众团结一心、共赴国难，万盛民众也积极行动，贡献力量。

（一）献机报国：工业重镇的空中支援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发起“献机运动”，号召民众捐款购买飞机，许多商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南桐煤矿作为战时重要资源生产单位，在高效生产的同时，组织职工募捐，按文官军用技术人员薪额及陆军人员官阶薪额比照表扣缴款项。用筹集的款项购买以“军党号”命名的战斗机，成为重庆募捐购机中以“军党号”命名的 4 架飞机之一，为增强空军力量贡献了工业重镇的力量。

（二）战地传奇：刘子如的爱国担当

抗战爆发后，年已 67 岁的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刘子如积极组建重庆战地服务团，筹集 40 多万件物资，带队奔赴皖南前线，为国共将士服务 3 年。陈毅将军感其爱国热情，题赠“送给站在抗日最前线的刘老团长留念”大幅照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他颁发“服务前线、卓著成绩”的陆海空军褒状。刘子如的爱国壮举，彰显了工商界“实业救国”的情怀。1949 年 1 月，刘子如在故乡万盛去世，2005 年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重庆历史名人”，是 200 位重庆历史名人中唯一的慈善家。

（三）无名丰碑：沉默的血火记忆

抗战期间，许多民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南川县志》记载，1939—1941 年，日军侦知海孔洞一带有飞机厂，先后 5 次派飞机轰炸，因工厂隐蔽防护较好未炸中。1939 年 10 月 13 日上午，18 架日军飞机轰炸飞机厂未果，恼怒之下轰炸南川县城，造成 168 人死亡、310 人受伤的惨剧。

还有众多籍隶万盛的将士奔赴前线，如 9 岁参军，不到 14 岁奔赴缅甸抗日战场的傅开良；拼刺刀守城，誓不当亡国奴的向重发；两度从军抗日的黄冀生；英勇作战的抗日空降兵湛治由等。其中不少将士血洒疆场，有历史记载的抗日阵亡官兵如原万盛乡：张炎平、王正才、王文仁、郑少清、何述周、傅海云、傅

洪州、傅夕云；腰子乡：李青山、李昌林、李少成、李朝阳、李云宁、李云光、李平安、张少安、张军谷、陈元青、傅开隆、傅少青、冯云青；丛林乡：张江州、马少青；青年乡：犹敬伦、翁远志、范树清、李平安、兰鸿模、王树清、文海云、黄少成、罗能、王友余、钱海连；建设乡：李光德、李南钦、赵树荣、赵品昌；金灵乡：许永述、梁宴程；兴隆乡：秦德三、犹香钧、罗之臣等。因万盛当时分属南川、綦江、桐梓三县，还有部分将士无法区分乡籍未录入，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誓言。

五、历史回响：抗战精神的当代传承

万盛的抗战贡献，是中国工业内迁的缩影，更是全民抗战的生动注脚。南桐煤矿的蒸汽绞车声、海孔溶洞的机床轰鸣声、川湘公路的军车马达声，共同奏响了民族救亡的激昂乐章。2012 年，刘子如纪念地被授牌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3 年，海孔洞经国务院审核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历史地标，不仅是对往昔的纪念，更是对“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精神的永恒传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万盛的抗战记忆将永远激励后人：只要众志成城，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档案馆）

责任编辑：张 莉

治今彭水的涪陵县设置考

王 东 王业培 刘应平

一直以来，涪陵县设置的时间，都沿袭历史资料记载的西汉建元初年（公元前140年）。编修《彭水县志》^①时也沿袭了这种说法，确定涪陵县设置时间为西汉建元初年，治所地在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随着对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发掘，特别是2002年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里耶秦简的出土，将涪陵县的设置时间提前到秦朝时期，最晚设置时间应是秦始皇三十一年，即公元前216年。一些学者对西汉设置涪陵县提出质疑，比如尤中、后晓荣、任乃强先生均认为涪陵县是西汉沿袭秦朝设置的。尤中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2004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认为“西汉沿袭秦制于巴郡设涪陵县。……秦灭巴国置巴郡之后，于原巴国南部边境设涪陵县”。后晓荣在《秦代政区地理》（200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认为“秦时汉初涪陵

县即已置县，其故址在今重庆市彭水县”。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认为涪陵县是“秦旧县也”。

笔者查阅了一些现存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实物资料，对涪陵县设置时间和县治所在地的变迁进行了粗略地梳理、考证，供本地历史研究者和史志编修者参考，不对之处敬请指正。

一、现存早期文献资料中关于涪陵县设置的记载

最早记录涪陵的历史资料是《汉书·地理志》，上面记载有6个字：“涪陵，莽曰，巴亭”，说明西汉时期已经设置了涪陵县，但管辖地域和治所地未提及，意思是王莽时将涪陵县改为巴亭县。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②卷三十：“黔州，黔中。下都督府……今为黔州观察使理所……本汉涪陵县理，后汉献帝时分为四县，置属国都尉，理涪陵……贞观四年……其年，自今州东

①《彭水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②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1983年。

九十里故州城移于涪陵江东、彭水之南。”这段文字说明黔州治所地就是汉朝时期的涪陵县治所地，贞观四年（629年）才将黔州治所地从郁山迁移到今天的彭水老城区，“今州东九十里故州城”就是今天的彭水自治县郁山镇。

秦汉时期涪陵县治所地在今天彭水自治县郁山镇，很多历史资料上都有记载，如《元和郡县图志》《四川郡县志》^①。清·龚煦春《四川郡县志》：“汉涪陵……治彭水县东九十里之郁山镇”，这将汉涪陵县治所地准确的记载为郁山镇。当时的彭水县治所地就是今天的彭水自治县治所地。

二、涪陵县及其治所地的变迁

汉始建国元年（9年），改涪陵县为巴亭县，建武元年（25年），废巴亭县，重新设置为涪陵县。建安六年（201年），析涪陵县地置涪陵（治今彭水县城）、丹兴（治今黔江区）、汉葭（治今郁山镇）、永宁（治今贵州省德江县上费溪）四县，又称巴东属国。三国时期，章武元年（221年），改巴东属国为涪陵郡，涪陵郡与涪陵县治所同在今郁山镇。延熙十三年（250年），析涪陵县地置汉平县（治今武隆县地）。南北朝时期，北周保定四年（564年），涪陵郡“蛮帅”田思鹤“以地内附”，改涪陵郡设置为奉州。建德三年（574年）又改奉州为黔州。隋开皇十三年（593年），改涪

陵县设置为彭水县，治所仍在今郁山镇，彭水县名则沿用至今，而涪陵县名就用于今天的涪陵区。

北周保定四年（564年），田思鹤以地内附（归附）周，在今郁山镇设置为奉州时，又在故枳县（今涪陵区）地设置涪陵镇（治今涪陵敦仁街道大东门社区）。隋开皇三年（583年），汉平县从今武隆区移治涪陵镇，属渝州。隋开皇十三年（593年），因郁江古称彭水，而改涪陵县设置彭水县，州、县同治于今郁山镇。汉平县“因镇为名”，改称涪陵县。“涪陵”二字沿用至今，涪陵镇、涪陵县、涪陵专区、涪陵地区、涪陵市、涪陵区治所同地。

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②卷六十九引元代“胡三省曰：汉之涪陵，今彭水县也；今之涪陵，乃汉枳县也”，“汉涪陵地大而远，唐之夷、费、思、播及黔府五州，悉涪陵地”，“周武帝保定四年，涪陵首领田思鹤归化，于故枳城立涪陵镇。隋开皇十三年，移汉平县于涪陵镇，仍改汉平为涪陵县，因镇为名。唐涪州治涪陵，实汉枳县”。

三、考古发掘实物资料中关于涪陵县设置的记载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在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西郊的张家山247号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1236枚（不含残片）竹简，竹简上文字4万余字，

①龚煦春：《四川郡县志》，成都古籍书店铅印校点本，1983年。

②顾祖禹：《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读史方輿纪要》，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年。



里耶秦简（局部）（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字内容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和《遣策》等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对于研究西汉初年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二年律令》和《奏谳书》记录了西汉初期的律令和司法诉讼制度，使亡佚已久的汉律得以重现。其中《二年律令·秩律》中有“临江、涪陵、安汉、宕渠、枳……（简453）……秩（简463）各六百石（简464）”的记载。简文中记载有涪陵县，还记载有涪陵县秩禄（俸禄）是六百石，这与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是吻合的，印证了西汉时期及以后形成的文献资料的真实性。根据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①：《二年律令》之二年，实为汉吕后二年（公

元前186年）。也就是说各种律令颁布和实施的年代下限不会迟于公元前186年，这也充分说明在公元前186年前，就已设置了涪陵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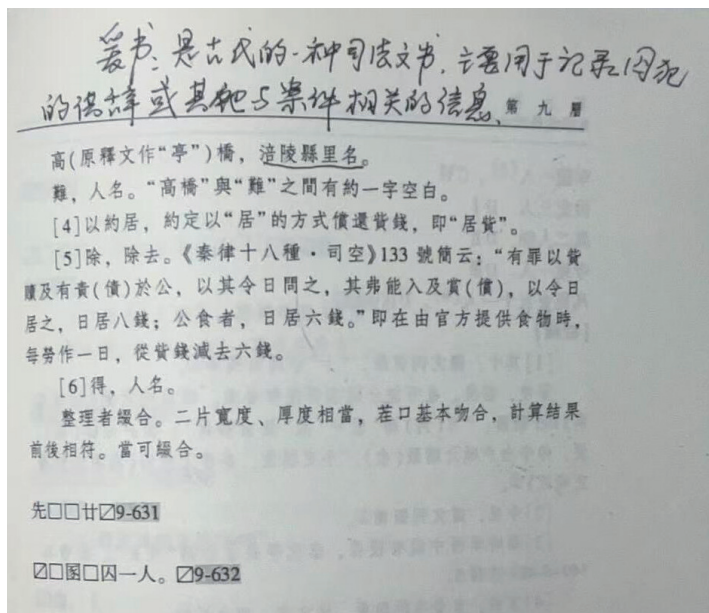
2002年6月，在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的一号古井和城北护城壕11号坑中抢救

发掘出38000多枚简牍，其中有文字的简牍19000枚，约20多万字，被誉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经专家学者整理、考证，除很少部分为楚简外，大多是秦朝（国）洞庭郡下辖迁陵县（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的文书档案，内容涵盖户口、土地开垦、物产、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奴隶买卖、刑徒管理、祭祀先农，以及教育医药等相关政令和文书。简牍纪年由秦始皇（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一年不少，并详细到月、日乃至时辰。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2012年和2017年出版了《里耶秦简牍校释（壹）》^②《里

^①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

^②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壹）》，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



《里耶秦简牍校释(貳)》167页内容

耶秦简牍校释(貳)》，公开了一号古井第五、六、八、九层共6000余枚简牍的图片和释文。在公开的简牍中有五枚关于“涪陵”的记载，其简牍文字如下：

8-650号简牍，载有“涪陵來以買鹽□摩千錢除少内□卻□(正面)多問華得毋□以前日所□養錢者□(背面)。

8-1094号简牍，载有“□□出贷吏以卒戍士五涪陵戲里去死十一月食□令史出□狗手”。

8-1206号简牍，记有“涪陵新里公士□□”。

9-630号简牍，记有“卅一年，后九月庚辰朔戊子，司空色爰书：吏以卒戍上造涪陵高桥□难有货钱千三百卅四，贫不能入，以约居，积二百廿四日，食

县官，日除六钱”。《里耶秦简牍校释》在注解上述文字时，有“高桥，涪陵县里名。”^①

9-496号简牍，记有“□作事，弗令歸涪陵黔□”。

(注：□表示简牍残断处；□表示简文残泐无法辨认的字，一字为一□。)

里耶秦简的发现印证了尤中、后晓荣、任乃强等历史学者们的质疑推断。9-630号简牍明确记载了“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后九月九日，司空色在记录一个

上造爵位官员的审理文书上写有：这个违反法令的上造爵位官员被发配到涪陵县的高桥里当戍边士兵”。里耶秦简是秦朝时期迁陵县真实的文书资料，是对当时事件的记述，其形成时间比现存的所有历史资料都要早，其真实性是不用质疑的。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涪陵县设置的最晚时间是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治所地在今天的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

(作者单位：王东为市委网信办干部，王业培、刘应平为彭水县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陈伟

①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貳)》，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

云阳茶事

叶仁军

中国人喜茶，那是骨子里的爱好。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相传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汉代，茶从巴蜀传入中原。西汉王褒《僮约》记载“烹茶尽具”，表明饮茶习俗已经形成。中国茶文化不仅仅是味觉上的享受，更是人生智慧的结晶。从陆羽“茶性俭”的哲学思考，到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跨越时空，连接自然、人文与世界，传递“和静怡真”的生活美学。

长江三峡产茶古已有之。陆羽在《茶经》中对巴蜀种茶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一之源》《七之事》等章节中，体现了唐代及之前巴蜀地区作为中国茶叶重要产地的历史地位。陆羽开篇即提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从地理范围看，明确指出巴蜀地区的“巴山峡川”是野生茶树的原生地之一，甚至存在树干粗至“两人合抱”的古茶树。《茶经》印证了巴蜀地区早在唐代之前就已存在野生茶树群落，可能与《华阳国志》中周代巴国“园有芳

蒨香茗”的记载相呼应。巴蜀气候湿润、多山雾，适宜茶树生长，陆羽虽未直接评价其品质，但通过野生茶树的记载暗示其自然优势。此外，《茶经·七之事》引用了多部古文献佐证巴蜀茶事，如：引《尔雅》注“蜀人谓之苦茶”^①。引《广雅》记载巴蜀地区用米浆调和茶汤的饮法。《巴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指出周武王时期，巴国已以茶作为贡品。《蜀志》“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南安（今乐山）、武阳（今彭山）是汉代著名的茶叶产区。

清乾隆《夔州府志·物产志》记载“夔地所出，虽无奇珍，而物土之宜，百昌嘉遂，生于山而育于水……盐、茶、铁、漆、桐油、麻油……”。可见，夔州所属县产茶。而夔州辖地正是长江三峡地区。

云阳县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生产和经营茶叶，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产茶历史。《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贡茶地区有十六郡，即山南道峡州夷陵

^①茶：古“荼”字。

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即云阳县）……由此可见，云阳当时就是贡茶产地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史料曾有“云阳县的桑坪、白崖、盐东、里平产茶300两（白银），销往云安”的记载。水市的“黄堆茶”、向阳的“犀牛茶”、千秋的“沈家茶”，茶叶芽头粗壮、持嫩性强，制成的明前茶，“条索紧卷，色泽绿润，白毫披露，汤水淡绿，香高味醇，叶底均嫩”，颇享声誉。

民国二十三年3月2日，国民革命军20军司令部在云阳实业考察报告中写到：“全县产茶1000斤，每斤0.5元，全年产值5000元。”民国三十六年3月14日，县政府向省政府呈文：“查本县所属乡镇，均不甚产茶，亦无制茶工厂合作社及茶叶工商团体”。

1973年，毛主席号召“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4月县委就组织重点茶区干部30多人，前往浙江上旺茶场取经。到1974年为止，全县办起256个社队联办茶场，开荒种茶23000亩，成为四川省茶叶基地县之一。

云阳县水系发达，长江经过县境68公里，四条一级支流横穿构造，成网状注入长江。汤溪河是长江干流上游下段左岸的一级支流，明朝以前叫东襄河，发源于大巴山南麓巫溪县龙台乡钟南村，河流由北向南，由上坝乡邓家院子进入云阳，流经沙市、江口、南溪、云安等乡镇，在小河口注入长江。汤溪河在巫溪境内又称湾滩河。河水冬暖夏凉，秋冬季节，沿河雾气蒸腾，如一条白色蛟龙，

故名“汤溪”。

汤溪河沿线是重要的产茶区，划分为澎溪流域名优茶区、汤溪流域特早茶区、东部高山优质茶区、江南高山特色茶区等4大茶区。有黄石、高阳、平安、云安、南溪、沙市、石门、洞鹿、龙洞、票草等10个茶叶基地乡镇。

沙市镇是汤溪河沿途的一个重要乡镇，原云阳县沙陀区公所驻地。由于这里是古今通往巫溪的要道，山区物资历来在此兴市集散，人称沙市。沙陀区的来历则是汤溪河经过此段，湾大水回旋淤沙成沱，泥沙聚集很多，昔称沙陀子。沙市镇明朝属安义乡云兴里。清末民初属云阳县北岸崇善里，黄连甲。民国前期属沙陀乡广运上甲。民国中后期属沙陀乡，共23保半。民国十九年（1930年）改属广运上乡，民国二十二年合置沙沱镇，辖28个保，民国三十一年改镇为乡，民国三十六年属第一指导区。

据典籍记载，沙市镇村民绝大多数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发展到现在有张、王、李、唐、周等姓。步入21世纪，云阳县政府高度重视茶叶产业，将其作为特色产业重点扶持。目前全县涌现茶叶企业19家，茶叶专业合作社8家，2022年产茶778吨，实现产值13020万元。

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周万才，是沙市镇复垭村人，事业有成。作为土生土长的复垭村人，周万才看着这一方山水，风光旖旎，秀美无比，如今因农民增收难，养家难，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挣钱，

村里无产业支撑，无就业机会，缺乏生机和活力，他感到无比心痛！

致富不忘家乡，周万才带头回到复垭村投资发展农业。复垭村位于沙市镇东部，海拔 800 至 1500 米，幅员面积 12 平方公里。自古民风淳朴、百业繁兴，曾涌现出许多工匠艺人。他们或用勤劳和智慧养家糊口、孕育后人；或以精湛的技艺闯荡街头，赢得了好口碑。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手艺人逐渐隐退于世人眼前。沙市镇曾有上百年的种茶历史。早在民国时期，沙市镇的富柿村就有成熟的茶园。虽经历史风尘的洗礼，茶园的兴衰变化，其茶叶仍然是重庆名茶之一，是云阳人馈赠亲朋好友的上好礼品。

发展茶叶产业和乡村旅游，成了周万才的不二选择。种植茶树对土壤、海拔、生态环境是有要求的。复垭村在农业部门规划的特早茶区地理范围内，但却存在海拔高于 300-600 米的中低山区域的致命不足，被茶叶专家认定为不宜发展茶叶的地区。作为复垭人，周万才并不信邪。复垭村海拔 800 至 1500 米，其海拔最高处剪刀架主峰高程 1723 米，他在这里建起了全县海拔最高的高山茶场——复垭茶园。

复垭茶园覆盖茶叶 2000 亩，最高海拔 1600 米，盛产安吉白茶，素有“云阳好茶”美誉。安吉白茶外形形似凤羽，色泽翠绿间黄，光亮油润，香气清鲜持久，滋味鲜醇，汤色清澈明亮。每年 3—5 月，茶芽初长成，游客可以参观茶园，体验采茶、制茶乐趣，品尝新鲜茶叶。创立“楠

贡御品”茶叶品牌，年产茶叶约 1000 斤，销售额达 200 万元，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 50 余个，带动 200 余人就业，当地群众务工年均增收 3 万元以上，村集体固定分红 10 万元以上，实现农民增收、产业增效、生态增值。

同时，周万才借助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开始一门心思打造乡村旅游，他争取沙市镇政府在复垭村开展人行便道、林木栽植、观光旅游等方面的项目，让自己的家乡走上茶叶、文旅、农旅、康养这样的综合发展之路。这个曾经一穷二白的高山村，不再羡慕沙市集镇上那繁华的“半边街”，不再羡慕那滚烫的汤溪河水。周万才甚至可以早上逍遥地在沙市街上吃一碗羊杂面，再开车顺着曲折的复垭茶道上到牛儿坪、剪刀架，管理自己的茶场，接待来自各地的游客。一到夏季，沙市集镇的“城里人”会三三两两来到茶园，纳凉、采茶、品茶、闲聊，这沉寂的大山顿时充满喧嚣，人语与鸟鸣相互呼应，生命的华章在此刻得到彰显。

悠悠万事，唯茶唯大。此刻的周万才，也许正坐在县城自己的茶店，一边品茶一边向顾客推荐自己今年的新茶——“楠贡御品”。他或许早已顺着复垭茶道开车直上，登上剪刀架主峰，俯瞰那一片金黄的茶园，黄金芽正呈现无限生机，给这片山别样的风景。

（作者单位：云阳县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周怡彤

丰盛赶场

刘凡君

据《巴县志》记载，丰盛场始建于宋朝。历史上曾是重庆到涪陵、南川、贵州省道真等州县的重要驿站。因丰盛地处巴县、涪陵、南川三地商旅要冲，至今三地交界处还立有一块高 40 公分的三角界碑，若将脚踏上碑顶，就有了“一脚踏三县”之说。

据清乾隆《巴县志》记载，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巴县知县孔毓忠对行政建制实行改编，当时丰盛场属仁里十甲。丰盛在清乾隆以前已有市，因地处巴、涪、南商旅要冲，物产丰富，商贸兴盛，故名丰盛场。时为巴县十大场之一。

丰盛场是黔渝两地陆路交通的中转站，也是涪陵、南川、木洞、洛碛等周边场镇陆路交通联系的必经之地。建场初始，商贾云集，商贸繁荣，商铺、钱庄、茶楼、酒肆、驿站、医馆、戏楼、庙宇散布全镇，有“长江第一旱码头”之称。场上曾有“刘”“杜”“杨”“冯”等大户人家，因商贾交换、交流的需要，在街上建起了自己的祠堂、会馆（所）。天长日久，丰盛场便从一个歇脚的驿站，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场镇，日渐兴盛

起来。

丰盛场依山而建，呈南北走向。八条街成长方“回”字型，仅有东、南、西、北四门方能进出，东往涪陵、南出南川、西行木洞、北到洛碛。街道多为青砂条石镶筑而成。石板街蜿蜒曲折，连着座座豪宅大院和条条深邃的小巷。街上青砖黛瓦、榫卯木结构、单檐房山式屋顶、二层楼双重挑檐、雕花木窗的明清建筑比比皆是。有四合院，有回廊，有大小天井。石板街临街面的房屋全为二层楼，上层住人，下层作店，清一色的木板门，便于开启，以利坐店经商。

丰盛赶场习俗历来已久。先是旧历逢每月尾数三、六、九。“文革”期间，国家号召农业学大寨，主要精力花在土地上，于是，改为星期日、逢五、逢十赶场。场口四个门有戴红袖章的革命小将把守，赶场的大人细娃儿需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才允许放行。改革开放后，恢复为三、六、九。2000 年，丰盛镇政府为满足广大群众的愿望，展示新千年，新气象，把赶场的日子重新定为一、三、五、七、九。一直延续至今。

丰盛赶场的时间约定俗成。冬天，

天亮得晚，走田坎小道看不见路。早上八、九点钟，街上人稀少。上午 11 点后，人渐渐多起来，叫卖声、犬吠声、嘈杂声，声声入耳。下午三、四点以后，喧嚣散去，赶场人拖着疲倦的身子，带着采购的商品，出街口，沿着来时的小道渐渐远去。夏天，天气热。天一亮，就有赶场的人往场上走，图的是凉快。中午时分，赶场达到高潮，烈日下，只见街上一顶顶草帽仿佛在云里游弋。

丰盛赶场的目的各异。清乾隆《巴县志》记载：“日用所需，取给场镇。日中为市，以有易无，民咸便之。”因此，赶场不外乎：一是交易。也就是或买或卖。张二狗家里盐巴没得了，堂客有交代，把红苕卖了买两斤盐巴回来，再给大妹崽儿扯三尺布，二娃子买一双鞋，

么姑娘买一颗发夹。二是会友叙旧。李家大队的黄大汉退伍了一年了，十分想念在木洞乡也在挖土的战友马二哥，托人带话，逢五赶场见。有的亲戚之间走动少，若上门还要送礼物。场上见一面，撇脱。打打话平伙，不仅省了钱，还增进了友情。三是喝茶吃酒。走进酒馆、茶馆，吃的是气氛。坐在长条凳上，与一帮难兄难弟勾肩搭背，么五么六，大声虎气地朝街上喊张三、李四、王麻子，惹得赶场的人羡慕、眼红。四是赶耍场。图的是讨个好心情。即使不买什么货物的闲人，也要去赶热闹，喝两个单碗（二两白酒），买一个馒头，饱饱口福，也算是赶了一回场。周三哥单身一人，一天到黑都在土里刨，没得人说心里话。他就盼赶场天。啥也不买，就在人流中穿行，在拥挤中



丰盛古镇（冯亚宏 摄）

体会热闹。每当看到了一个熟人，周三哥就热情招呼：吃了没得！午后2点，周三哥要出工，回到家里才感觉肚皮饿，但没有人问他：吃了没得！

丰盛赶场热闹非凡。据原丰盛镇镇长田茂华介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间，赶场的人最多时达12000至15000人。其中，本场人及周边乡镇的人占80%，其余的是涪陵、南川等地的外地客。特别是腊月间，农事已完，闲在家里无事，大人要赶场，细娃儿要撵脚。于是，一家大小都往场上涌。那时，田茂华任丰盛乡蚕桑员，遇到发通知开会，他就趁赶场之际，随赶场的人流沿着“回”字街“挤”一圈，看见熟人，就招呼，或代话，或代通知。先，顺时针走，然后，再逆时针走。这样下来，往往需要一两个多小时。

丰盛赶场交易繁荣。每逢集日，坐镇的商户开市营业，远路的商家前去摆摊设点，周围的村民前来赶场，大多带着自产的白菜萝卜等特产去叫卖，买回需要的日用生活用品，也有贩卖牲口的，打农器家具的，染布、抓药、称盐、打煤油、桐油的，各取所需。每到腊月临近年关时，男女老少都去赶集，置办年货。这时的丰盛场，人山人海，挤来挤去，水泄不通，一片热闹的景象。

鸡市坝是农副产品市场，主要经营自产自销的粮食、禽畜、蔬菜、药材、农副产品等。计划经济时期，缺吃少穿，买卖粮食，是赶场人的主要目的。而今，

小麦、稻谷、玉米、高粱、大米等等，要有尽有。各种时令蔬菜都是环保产品，抢购的人多。还有出自于农家之手的腌菜、咸菜、酱菜和盐渍蔬菜等，也是赶场人的抢手货。

寿字街后面的空坝是竹器市场。丰盛乡物产丰富，竹林成片，竹器众多。生活用具类的有：竹背篋、竹涮把、竹凉板、竹箕、竹筛、竹篮、竹笠、竹筷、竹椅、竹床、竹帘、竹盖、竹蒸笼、竹席、竹扫、竹筴；农用类的有：竹箩、竹耙、竹扁担、竹围席等。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人穷，大多住不起瓦房。于是，竹器市场上成捆成捆的竹子是俏货。这些竹子是修建茅草房不可缺少的材料。

涪陵场口是猪市场。买猪、卖猪的聚集在一起。一到赶场天，猪声震天。十字街食品站是定点宰杀生猪的地方。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规定：一家若养两条猪，杀一条，交国家，留一条自己吃。若养一条猪，交一半给国家、留一半给自己。猪脑壳一家一半。丰盛乡的风俗有讲究，过年要拿“梗”（geng）脑壳祭祖宗。哪个办？杀猪匠有办法。杀猪刀划到猪脑壳时，做一个“跛子拜年就是一歪”的动作，于是，国家吃小脑壳，农民伯伯吃大脑壳。放在祖宗面前像是一个“梗”脑壳。王家大队的耿么娃家穷，一年到头杀不起猪。年初，买一头小猪仔，养几个月，就牵到市场卖，再买一头小猪仔，又养。周而复始，成了猪市场的常客，但不知肉味。改革开放，丰盛的

农民杀得起猪了，不再为吃“梗”脑壳伤脑筋了。于是，杀猪匠的生意也好了。冬至刚过，杀猪的多了起来，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丰盛赶场“闹”而有序。常言道，有国家，就有管家。为了保证丰盛赶场时的正常秩序，丰盛镇专门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简称“市管会”。赶场天，市管会的人右臂戴着红袖章，全面出击打击投机倒把者。计划经济时期，物资紧缺，给投机倒把者钻了空子。有的专倒什么布票、粮票、酒票、肉票、油票；有的专倒农副产品，什么化肥、农药；有的专倒鸡蛋、鸭蛋等。缺什么，倒什么。往往是甲地买、乙地卖，赚点差价。为逃避打击，倒票证的在人群中走动，看见一个穿中山装的，或衣服穿得周正一点的，就用手倒拐撞一下，低语：八搭二！八搭二！意思是要不要酒票。遇到有意向者，就边走边讲价，边成交。隐蔽性很强。丰盛场鸡蛋便宜，5分钱一个。木洞要7分钱。鸡蛋贩子苟四眼见有利可图，先买30个，找一个地方收藏好，再买30个。如此往复，皮背篋里装了整整200个。逢七拿到木洞卖，一下就赚四块钱！那时，工人老大哥一月的薪水也不过18块呀！数钱时，有人羡慕：四眼，请吃酒！苟四眼谦虚地回答：吃得起稀饭，吃得起稀饭！

常言道，山多出杂木，人多出怪物。到丰盛赶场的人中也鱼龙混杂。丰盛赶场有“四多”。

一是扒手多。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一到赶场天，木洞、五步河、双河、太平乃至重庆的“扒二哥”云集丰盛场。“扒二哥”一般二至三人一伙，一人盯“货”，一人打掩护，得手后，一人当二传手，配合娴熟。计划经济时期，国贫家穷，很少有人怀揣皮夹子，钱一般放在婆娘堂客或老太婆的帕子里，包了一层又一层。于是，“扒二哥”就找这些人下手。五步河高家院子的高大娘听说丰盛场的猪儿价格比五步乡高，于是，天不亮，就牵起猪儿赶路，好不容易讨价还价卖了20块钱，等到回家给老公捡几副中药治病。20块钱拽在手里，手揣在裤包里，一直提心吊胆。不知啥时候松了手，还没出场口，就被“扒二哥”把钱偷走了。高大娘顿时哭得死去活来。一次，逮住了一个小偷，满街的人喊打，喊捶，打得那小偷嗷嗷叫，既可恨，又造孽。改革开放，赶场的人多了，但小偷少了，毕竟，社会在发展，人的素质也在提高。

二是打架多。打架的地点就在离场口不远的操场坝（现丰盛小学）。丰盛场周边的农民讲义气，尚武义。村连村，乡连乡，关系盘根错节，千丝万缕。一家有难，大家相助。有时，常常为一两句口角，忍不下一口气，说明天街上见！二大队的邓莽子性格粗鲁，乐于打捶。听说三队的李干筋把自己的兄弟“锐”了一番，不依教，于是，第二天拉帮结伙到操场坝与李干筋“单挑”。幸亏，

镇武装部知道了信息,制止了械斗。如今,在操场坝再也见不到吵架割孽的现象了,听得见的是朗朗的读书声,文明代替了野蛮。毕竟,社会进步了。

三是算命多。一遇赶场天,四个场口都有不少算命先生摆开阵势等待求卦。算命俗称算八字,以人的生辰年、月、日、时干支各两字组成“八字”,据以推算一生命运,吉凶祸福。旧时,操业者多为盲人,敲竹板或拉胡琴作招徕。有的写八字单,有的口头预言。以前,丰盛镇的青年男女订婚前要算八字,若“相克”,便不能结婚。太平乡的侯五信邪,请八字先生算命运,先试探问:我父母在不在?八字先生说:父在母先亡。侯五大惊!说:算得好准啊!我老汉的确是在母亲前面先死啊!侯五一高兴,给了八字先生两块钱。回到家给左右邻居说:张八字算得好准啊,好准啊!会计高大全读了几天书,懂道理,说:侯五,张八字的话是骗人的。父在母先亡是双关语。如果你母亲先去世,他也可以说,父亲在,而母亲先去世。侯五一听,有道理,连说:大哥,怪我没得文化!其实,算命者也难卜自身祸福,纯属骗人钱财。

场口也有看相的,叫相师。根据人的相貌、手纹、骨骼、气色来判断他一生的遭遇及解脱厄难之法。妇女一般不请人看面相,仅看手相。街头相师察言观色,随机应付,口称“指点迷路英雄”,授以“消灾之法”,借以糊口。有个相师给一王二狗相面,看了看王二狗的长

相,道出一段话:“头大额颇宽,长大好做官;头小额颇窄,长大好做贼。”逗得王二狗哈哈大笑。看手相,男左女右,将掌纹分作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揣摸人的心理,说长道短地评说被看者的吉凶祸福。看指纹时,以指纹形成箩状(圆形指纹称箩)来决定人生的前途命运。有“一箩穷,二箩富,三箩开酒店,四箩卖豆腐,五箩骑白马,六箩养黑猪,七箩会写字,八箩会读书,九箩创天下,十箩造大屋”之说。

四是酒疯子多。那时,不兴打牌,就喝酒。酒是桑泡酒、红苕酒,很劣质,糙辣,度数高。吃酒兴游走,下街吃到上街;张家酒馆,吃到李家酒馆。吃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然后,上街窜到下街,东街窜到西街。酒疯子分为文疯子和武疯子。文疯子酒劲上来了就说、唱、骂。太平乡的曾疯子喝醉酒后,就喜欢坐在街沿口说他的平凡身世,说队长婆娘拽得很,穿一件的确良,咔叽裤,一摇一摆的,好像屋里有两担谷子吃不完;说队长表哥屁股有块胎记,巴掌大,怪不得打人狠,结果,生个娃儿没得屁眼。五步乡的颜疯子喜欢唱,唱腔没得调调,忽高忽低,纯属随心所欲。他唱:

豌豆花,胡豆花,喇叭敞敞南瓜花;
襟襟吊吊麻柳花,八十岁的老太婆纺棉花……

边唱,边舞,像跳端公一样。后面

跟了一群娃儿妹崽，给他拍手扎场子。
他又唱：

正月嘛龙灯玩下山坝哟，
二月嘛春草遍地发哟嘿呢哟。
三月呢哟白纸嘛坟上挂哟哟，
四月嘛秧把哟手中拿哟嘿呢哟。

有好事的娃儿拿一把谷草给颜疯子：
颜大爷，跳起来，跳起来！于是，正在
兴头上的颜疯子又扭起了秧歌，边扭边
唱：

太阳呢落坎呢又落坡哟呢，
媳妇呢关门呢打婆婆哟呢，
这个哟么年辰呢颠倒了哟呢哟，
耗子呢咬到哟么猫耳朵哟呱——呢——

丰盛场口有个武疯子，打人。每到
赶场天，就泡在酒馆里。喝得脸红筋涨，
走出酒馆，东倒西歪，二恍二恍的，闷
声，见人就抓扯，打两耳光，把神光退
了。一年，腊月二十七，武疯子连续打
了五个人，时任丰盛乡的一位领导路过，
劝不住，后通知张公安，把武疯子拘留
了十五天。酒醒了，年也过完了。

丰盛赶场是“晒宝”会。所谓“晒
宝”，就是赶场时村民们穿上拿得出手
的衣裤，“现宝”似的走在一起，像搞
服装展览。瞬间，时代风云尽收眼底。
旧时，男人冬天多穿长衫，以布袋扎腰，
便于别旱烟袋。中老年男性穿空心棉袄，

谷草系腰，多以白布长帕包头，盘绕数圈。
夏天，多穿对襟衣或短夹衣。一般用土
布或白布浸染缝制，颜色以蓝、黑为主。
足穿水巴笼草鞋、线耳草鞋。肩挑重物时，
肩披圆形遮肩的“担肩”，保护肩部的
肉皮损伤。雨天，戴斗笠，披蓑衣，穿
草鞋或赤脚；少数人穿皮底皮帮或皮底
布帮，并用桐油浸渍过防滑钉鞋，习称
“鞋爪”。晴天，多穿布帮布底或人工
用一针一线缝制的双绉布鞋，贴脚轻松，
行走方便。

老太婆赶场也讲究，头发梳得溜光，
着上衣长可近膝。流行阴丹布。有的喜
好蓝、黑二色。年轻婆娘喜欢穿戴花围腰，
腰以上呈覆斗形，胸前有绣花图案，饰
以花边，缝缀小件银饰、银扣，用两头
绣花的白布带，在腰后栓成蝴蝶结，花
带飘垂。冬天，有的中老年堂客喜欢包
白布头巾，讲究浆洗白净，边幅摺的齐
整。老太婆喜用有皱青丝帕，柔韧耐用。
有戴窝帽，帽外再包帕的。未婚女子穿
戴干净、朴实，喜用彩色头绳扣成蝴蝶结，
扎成脑后独髻或梳两条小辫。

对丰盛乡的村民来说，赶场是一件
庄重的事，穿着不可随随便便。王家湾
的张二黑要赶场，从衣柜里翻不出一件
像样的衣服。于是，在院坝日绝婆娘不
贤惠，连一件赶场的衣服都不给男人制。
马家的媳妇荷花每到赶场时，不晓得穿
啥子，问老公，老公说：上次赶场那件
花衣服可以，漂亮。荷花不高兴，说：
想得出，别人以为我只有那一件衣服！

场口的李老五每次赶场前还要犁三块田，然后，在田边把脚洗了，“笼”一双草鞋，身子擦了，喊婆娘拿一件褂子，套上，再用一根汗帕往腰杆上一扎，才出门。

赶场天，男人见面说，你娃好“操”，又买了一件新衣服啊！女人见面说，幺妹，你这件衣服好合身，该歪死了！^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男人流行穿对襟衣、中山服、学生服、青年装、黄军装；女人喜欢穿琵琶襟、春秋衫、的确良、花衬衣等。但丰盛乡的女人们保守，不穿裙子，说那是降落伞，大腿空落落的，遭男人看稀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丰盛乡赶场时开始流行各种服装，纷繁富丽，竞尚新潮。色调从蓝、黑、灰、绿等暗色，转到咖啡、鱼白、鹅黄、红、紫等，冬

深夏浅。时装花色、式样日益追求时尚美观，质地渐趋高档。丰盛乡赶场服饰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丰盛赶场最高兴的事，是召开物资交流会。一般一年或半年要举行一次。交易时间两三天，最长5天。规模大，赶场的人数和商品品种数量，都可达到平常赶场的几十倍。参加交流会的不仅有本场的，而且有来自邻乡、邻县以至于外省的，称得上商贾云集。交易的货品主要是工业用品、农业生产用具、服装鞋袜等用品。赶场的村民总是把一年所需的主要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的购置，寄希望于物资交流会。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每次，丰盛乡供销社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组织货源。徐幺娘早都想买一个暖水瓶，可惜，没得

工业票，这下好了，嫁姑娘有陪嫁了。王大婶一直想给男人买一双水胶鞋，缺货。听说交流会多的是。半夜起床赶早场，排轮子，终于如愿以偿。向二嫂买了一口大铝锅，意气风发顶在头上遮太阳。王二狗眼红，道：二嫂，听说供销社销库



丰盛古镇十全堂碉楼（郑彬 摄）

^①该歪：方言。漂亮的意思。

存,买底货,注意点,不要买到“歪”的哈!向二嫂眼睛一鼓:各人爬!原任丰盛镇镇长田茂华说:物资交流会在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城乡交流,便利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都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丰盛赶场最幸福的事,是春节玩龙灯。春节期间,丰盛周边的村民闲得无事,一到正月初三,一家老小起大早。出门前,换上新衣,把脚洗了,平日舍不得穿的黄胶鞋也拿出来“笼”起。苹果娃见妈老汉穿新衣,也嚷着要。衣服从箱子底拿出来了,但妈老汉不给穿。出门一直翻过垭口,快到丰盛场,才三下五除二套在外面。赶完场,一出场口,就开始脱,脱得苹果娃哭兮兮的。

从北门走进场口,经江西街、半边街、垭口街、十字街、书院街、长宁街、寿字街、公正街,只见人山人海。街左右两边的门面,贴有大红春联、红窗花,一派喜气洋洋。小学操场坝中间,正在表演二龙戏珠。由许多人各举一节木柄,左右挥舞,使龙体在空中悠悠蠕动。龙头似驼,龙眼似虎眼,龙耳似牛耳,龙角似鹿角,龙鳞似鱼鳞,龙身似蛇身。舞龙时,龙体内的蜡烛,忽明忽暗,仿佛像闪亮的萤火虫一般。

表演开始了,舞龙者以跑阵为主,一会儿双龙交错;一会儿呈四边形;一

会儿龙头向前、龙体左右对称呈“凤凰展翅”;一会儿双龙相对、扭“8”字形呈“长蛇阵”……

两条龙追逐着两颗宝珠,时而昂首如飞腾于云天之上,时而低回若游于波涛之中……

苹果娃个子矮,老汉又抱不动,只好将皮背篋扣在地上,苹果娃踮起脚尖看热闹。龙舞时,还伴有号角声和口吐缕缕烟火,焰火带着响声窜来窜去,目不暇接,苹果娃很是开心。

正月初一,是出龙日。丰盛乡所有的龙灯都统一在这一天上街游行。到了正月十五收龙,这一天,最为隆重场面,整个丰盛场热闹非凡,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全场火炮齐鸣,锣鼓喧天,火树银花。除玩龙灯外,有高跷队、腰鼓队、秧歌队、歌舞队,还有踩龙船、耍狮子等。

春节一过,就开始春耕。于是,新的一年开始了。丰盛场又像往日一样,等待商贾云集,热闹满天。

当繁华与喧嚣淡淡而去,丰盛场街上的青石板留下了一段岁月沉浮的痕迹,留下了一段古朴而沧桑的历史,还有一段丰藏古今,盛名天下的巴人传奇……

(作者单位:重庆大江工业集团)

责任编辑:周怡彤

说说米亭子

江春葆

米者，给人以温饱，一日不可或缺；亭子者，给人以歇脚小憩之场所。这两者于久远的岁月中合到了一块而成米亭子，且是渝地城区著名“米市”的代称。自问世起直到最后的消失，米亭子有着怎样的一段时光刻痕呢。

米亭子的形成

渝地旧时之城，一座是明初而来“九开八闭”的重庆府城，一座是重庆府辖清道光年间江北厅的“八开门”江北城。这个米亭子及其米市，在相拥的重庆两座老城中各有一个。随着这两座城的人口日益渐多，食米者的需求渐旺，粮商粮贩趸售与零售也日益繁忙。

要说这两座城中最早的食米趸售市场诞生于何处，于今而言，确实很难寻觅了。

查阅相关志书和地名录，米亭子（米市）也许可追溯至名胜庙宇。那时，知名的庙宇往往搭建有可供朝香者歇脚的凉亭，如府城中北宋年间的治平寺（今名罗汉寺）、明清年间较场口一带的鲁祖庙、关帝庙以及江北城的吕祖阁、文

昌宫等。这些庙宇中较为宽敞的亭子之地，有的后来就成了食米的买卖场所。由此而形成了这两座城中以米亭子相称的米市。两座城的米亭子（米市）一个位于今较场口的磁器街与鲁祖庙之间，一个位于今江北嘴的科技馆馆址下。

自从有了米亭子（米市），与粮食相关街市和专卖场所也日趋完备。以府城为例，那时较场口一带不仅有专门的“杂粮市”和以零售为主的“小米市”，还有磨房街、磁器街、铁器街、竹子市、猪牛市等。此时的米亭子市场则是以批发即趸售上等米（时称山米）而著称。

米亭子的功能与规模

府城中的米亭子，因城成型早，人口规模大，于此相聚的粮商粮贩自然亦多。以1860年为标志，府城中的粮商粮贩不仅购买了米市中的一处房产用作会所，还正式将原组织“财神会”改作“米粮帮”。每年的“六月六”，他们都要依惯例举行祭拜神主（镇江王爷）的仪式，同时检讨“帮规帮约”，以期对米市的米价、产地来源、批发与零售和新

设场所都加以掌控，达到所谓的“互不相侵”“各图所利”的目的。

1890年，随着重庆开埠，各行各业一时兴旺，城区人口增加，居住区也不断延拓，原本仅靠“江巴（江北厅、巴县）”两地及紧邻周边的县份所产大米已远远不能满足食米者的需求。这时，沿长江、嘉陵江上下游的纵深腹地所产大米源源不断的从水上运来，时称“河米”。运进的“河米”在重庆的米市统称作“碛米”。

为什么称它是碛米？一是这些河米多为糙米，二是运米的船只多停靠在沿江浅水砂石之处。按照“市场各不能侵”的帮规帮约，河米交易只能设在泊船处长江的菜园坝、朝天门和嘉陵江的曾家岩、临江门等地。

较场口处的米亭子一直以来都是趸售中心且趸售的是山米。山米就是专指色泽油润、味道可口的所谓上乘之米，其价格要高于河米。在城中，山米经销除米亭子外，增加有金马寺、大王庙、紫霄宫、龛学巷等。临江的有磁器口、海棠溪、弹子石、铜元局、香国寺等多处。据资料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米亭子的市场占据了整个山米销量的三分之一。同时成为城区最大的大米市场，既有批发，又有零售。

江北城起于清道光年间，与府城相较而言，其时间晚、规模小。民国年间，城内居民保持在3万人左右。其食米交易按人均每天消耗1斤来计算，每天进出江北城米市的大米约3万斤左右。其

中，大宗食米的购进，则需要到较场口的米亭子趸售地批发。

民国时期的米市管控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重庆城区居民人数约有20来万，粮商粮贩年经销的粮食约在八千万斤。到抗日战争前期，中间除却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引起的大米输入受阻、价格一度上扬外，其所分布的场所与大米价格处于一个相对的平稳状态。

进入抗战期，重庆成为“陪都”，市区范围向周边扩展并划分为18个区，面积达到164平方千米；人口由1936年的47万达到峰值126万。随着猛增人口的需求，原米市的行栈商、运销商、零售商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其中零售商数量由1937年的270家增至1942年的570家，一度曾达到1500多家。不仅如此，粮价也随之年年上涨。

为了管控粮价，稳住市场，是时的政权对粮食的产供销及其米市、米价等加以严管，并对城中这两个米亭子（米市）的每天交易量及其价格实行抄报监控。还一度硬性要求城区的米粮一律集中于米亭子市场交易，以应对并抑制不断飞涨的米价。同时，对这两个米市所使用的量具也实施重点监管。当时米市交易所使用的量器，一度极其复杂且紊乱，有“河斗”“老石”“老斗”，还有推广使用新制的“市石”“市斗”等。

固有一说,同样的大米却“十里不同价”。

这两个米市及其整个市场价格,在旧政权统治的末期,随着币制改为金圆券一年不到的时间又改为银圆券,本就一直高企的米价犹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1948年6月16日,爆发“抢米事件”,即重庆城内外76家米店52万斤大米被抢,导致309人被逮捕,1人被判死刑,1人被判无期徒刑。这与那时“国统区”各地时常发生抢米风潮一样,均因接连飞涨的米价已经到了骇人的地步,使得底层市民忍无可忍,只能铤而走险。这一方面,充分暴露出旧政权统治腐朽没落与无能;另一方面,揭示出那时的粮商粮贩与官商勾结,囤积居奇,推高米价之剥削本性。有人计算过,1936年1月,买一石米(约127斤)的价钱,至1949年4月,这时连一粒米也买不到了。还有人做过精确的算计,一斤大米约有1万余粒。从而见得,在旧政权崩塌前,处于风雨飘摇的米亭子(米市)的米价已经到了难以用数字计算的地步。一个同口径币制折算了的数据表明,1949年11月28日(重庆解放前)的米价,比1937年每市石(160斤)12.4元,上涨至4838万亿倍。

米亭子的新生与谢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庆市人民政府为保障供给,实行米价“双轨制”与改造旧市场相结合,规定私营米商集中于城中的米亭子统一趸售。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重庆全面建立起“统购统销”和国营粮店供应体系,米亭子(米市)结束了它的使命。

此后,城中较场口一带拓路改造,原分别名米亭子、小米市、况家巷,1972年合并改为现名,即今名小米市。

2003年,江北城纳入市人民政府旧城改造项目,2万多人口、一百多个单位需要动迁外移。其中,位于米亭子19号的米亭子小学搬迁于今天的嘉陵六村10号。米亭子1~75号随着重庆科技馆拔地而起,也淹没于历史的深处。

引用资料:《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省粮油市场志》《重庆市粮油志》《重庆市市中区志》《重庆市市中区地名录》《重庆市江北区地名录》

(作者单位:江北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陈伟

江津古道行：梵音叩响的地理琴弦

强 雯

一

六月的四川盆地东南缘骄阳似火，川东平行岭谷区在 38 摄氏度的高温下蒸腾扭曲。然而，那条深嵌于华蓥山帚状褶皱带丘陵沟壑间的明清川渝官道（东大路）江津段的召唤，驱使着我们踏上寻访之路。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母城出发，车行四五十分钟，跨越几道低缓的背斜山岭，便能抵达长江南岸、地处川东平行岭谷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的江津，我们在江津圣泉街道停车。甫一下车，目光便被公路对面几个饱经风霜的朱红大字攫住——“成渝古道”。它像一块路标，无声地指向地质构造与历史人文共同塑造的时光深处。

我和同伴相视一笑，古地理探寻的序章由此开始。

其实，成渝古道，全长 1080 里，通行于千百年。因地理上重庆在成都之东，故名“东大道”或“东大路”，是古时重庆到成都的必由之路，路上成天有快马、骡马队、轿子、滑竿通行。往来于成都、重庆的达官显贵、商贩僧旅和普通市民特别

多，有时也可见军队。如今这些古道零散荒芜，但江津段却颇令人回味。官方标识宣告此段古道足有 18 公里，北起江津圣泉街道双龙场，南抵缙云山红豆村，海拔落差达 300 余米，是成渝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古道活化石。



成渝古道江津段

二

此次探寻主要穿行于浅丘宽谷地貌。我们深吸一口灼热的空气，决心以脚步叩问这条始于宋代的茶马之道。千年古道隐藏在村户农田之中，好在当地随时有标记，有时，它是路边顽石上的简单“古道”刻字，有时是垃圾桶上的朱红漆字路标，有时又会被新修的“村村通”道路打断，但这正像古人留下的密码，引导我们不断深入、摸索。脚下的古道，由本地开采的青灰色石灰岩板铺就，被无数足迹打磨得光滑圆润，在卫星定位尚未问世的年代，商旅们以“十里一铺、六十里一驿”的方式丈量旅程。清朝初年设置的五个驿站中，白市驿与来凤驿如同双子星座，拱卫着江津的商贸命脉。江津段的这条成渝古道，暗含了古代商队坚韧与执着——在驿马飞驰的官道上，八百里加急信使一日竟能疾驰六百余里，堪称中古时代的“高速公路”。

如今，这条古道高高低低，蜿蜒起伏，清晰勾勒出山地的脊梁与谷地的轮廓。知了不停地在身旁鸣叫，四周绿意盎然，乡村一派丰盈，徒步之美，我们每一步都踏在历史与地理的交汇点上，感受着微小的海拔升升降降。

穿过一片开阔的侵蚀宽谷，大片农田铺展眼前。这里土层较厚，灌溉便利。采摘殆尽的花椒树，枝桠虬劲，光秃秃地立在田埂，空气中弥漫的辛香，是这片“中国花椒之乡”最独特的地理印记——得益于江津独特的紫色土和亚热

带湿润季风气候。与之相邻的，是整饬如棋盘般的麦田。毗邻处，麦田如碧海棋盘，绿浪在热风的号令下，整齐地奔涌、翻卷，直扑向远方由三叠纪石灰岩铸就、青黛蜿蜒的山峦，云雾山余脉，天地间，泼洒着刚柔并济的壮阔油彩，我环顾四周，仿佛听见它们对河谷阶地的汹涌礼赞。

青山不远，峰回路转。走过几片田地，抬头望去，一座古塔的剪影静默地矗立在前方山脊。路人遥指，那是此段驿道的终点，也是地理的分野。从那里，古道如一条坚韧的藤蔓，向北攀升，进入更为典型的川中丘陵区。它将依次翻越璧山附近的缙云山余脉、穿越永川箕山山麓的浅丘、切入沱江中游的内江河谷阶地、横跨资阳一带的川中台地（方山丘陵），最终抵达富庶的成都平原。指示牌上300多公里到成都的数字，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是商旅脚夫用血肉之躯丈量、跨越数个次级地理单元、累积近千米海拔高差的地理鸿沟。我们不禁想象：负重的马匹、疲惫的旅人，如何在“穿鱼线”般崎岖逼仄、时而沿背斜山脊线盘山而上，时而顺向斜谷地跋涉，时而沿溪流深切峡谷临渊而行，背夫、旅人日复一日如何辛苦地对抗着重力与距离？单是走到视野尽头的璧山，其间的峰回路转、爬升下降，就足以耗尽心力。

三

寻幽探径，景随步移。前行途中，

一段浪漫小径直入面前，这可能是古道利用一处侵蚀凹口或山坳开辟的捷径。浓密的三角梅如瀑布般倾泻，形成一道灼灼燃烧的花廊。阳光奋力穿透层层叠叠的花瓣与枝叶，在古道上投下细碎、跳跃的光斑，如梦似幻。我们忍不住驻足，让相机捕捉这地理空间里意外的美学馈赠。

再行不远，水声隐约可闻，一条清浅的溪流横亘眼前——这便是桥溪河了。它发源于附近云雾山，自东北向西南蜿蜒流淌，最终在江津城区汇入长江。一座古朴的单孔石拱桥横跨其上，这便是“古大桥”。桥溪河畔的古桥静卧如虹。当指尖抚过桥栏上“光绪五年重修”的刻痕时，热浪中忽然沁出一丝凉意——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单孔石拱桥，在1879年由县令国璋主持重建，他题写的“古大桥”三字虽已风化，但折柳送别的风雅仍在《世说新语》的魏晋余韵中回响。桥畔的桥溪亭柱础布满苔痕，亭中石碑记载着：“一河澄澈如练，一桥横跨古今”，此景曾让无数离人驻足回眸。

桥畔的桥溪亭，翼然临水，亭因河名。碑文告诉我们，桥溪河下游段保留着珍贵的河漫滩湿地生态系统，滋养着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金毛狗脊群落，这是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河岸带的典型植被。我不禁畅想，春日里，河岸两侧缓坡上万亩花椒林花开如雪，香气氤氲河谷；深秋时节，生长在丘陵中上部的枫香、乌桕则沿山坡次第染上红黄，如彩带般

缠绕着溪流与古道。古桥、溪流、驿亭，共同构成了一幅依山就水、和谐共生的古典地理图景。

我触摸着桥头“江津区文物保护单位”温热的石碑，烈日下的汗水仿佛也带上了历史的咸涩，一种穿越地理罅隙、与往昔魂魄相接的颤栗悄然漫上心头。

草木有心，石泉有语。在这样的路上行走，心中是欢喜的。

古道两旁，是丰富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次生植被地理志。枯黄色的毛桐果，如无数小巧的铜铃，沉甸甸地缀满枝头，在浓密的翠叶间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勾勒出林缘的线条，它们偏好生长在海拔稍低、水分较好的谷地边缘。红艳似火的绵毛茛苳浆果，则像散落的玛瑙，在灌丛与乔木的交界地带灼灼燃烧，点亮了林下的幽暗。更有那匍匐在道旁阴湿处的唇萼薄荷，毛茸茸的花萼探出草丛，散发着山野特有的、辛辣而清凉的气息，这是大地赠予旅人的天然提神剂与驱虫屏障。

光影在枝叶间追逐嬉戏，不时照亮零星散落在坡地梯田或林缘台地的乡人坟茔和整齐的菜畦，无声地标记着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的交融地带。

四

山势渐起，我们的视野逐渐开阔。

烈日炙烤的花椒林蒸腾着麻香，光秃的枝条印证着“江津花椒之乡”的盛名。而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带刺的灌木曾

牵连着一跨越大陆的贸易网络：明代驮着高山山茶的马帮经由此道，将茶叶送往晋陕甘青，远销俄罗斯。摘下一粒残留的花椒咀嚼，麻味瞬间引爆舌尖，同行伙伴呛出的眼泪与笑声回荡在田间。

不断消耗体力在对乡野的体味、品咂中得到了一点精神性补充。乡村的鸡鸭狗都时不时地出来问候我们几声。农田一派丰盛，玉米在田地里一个个饱满如爆，人见人喜。

汗流浹背之时，终于，我们抵达了一处显著隆起的山脊——金鼓坪古炮台

遗址。

石砌的台基踞于高地，一副斑驳的对联揭示其战略价值：“山横古道通巴蜀，雾锁高台隐甲兵”。顶端“金鼓坪”三字，点明了此地作为扼守古道、俯瞰下方宽谷与交通要冲的军事地理意义。一位在遗址旁卖凉粉的黝黑大嫂用乡音告诉我们，这是去年底当地政府修旧如旧的军事要塞，曾是守护商旅的钢铁哨卡。

这里是看住古道的眼睛啊！

我奋力登上台顶，视野陡然开阔！向西眺望，长江如一条玉带在远处平原

上闪烁；古道如一条灰白的细线，从我们脚下向西北方向蜿蜒，隐没于葱郁的丘陵谷地之中；近处，下方的桥溪河谷地、农田村落清晰可辨；更远方，是川东平行岭谷标志性的层峦叠嶂、由深绿渐次晕染成淡蓝的平行山岭，在通透的晴空下勾勒出巴渝大地跌宕起伏的壮阔骨架。

汗水如注，脚下的缓坡仿佛永无止境。我和同行者谈论着，古人如何在这不断爬升又下降、需翻越多个小型山梁，相对高差常在 50—100 米、曲折如肠的古道上，年复一年地征服着地理的阻隔？而此刻我们奋力抵达的，仅仅是江津地理单元内、长江以南丘陵区的一处高点。



成渝古道江津段上的古炮台

五

经过短暂的休憩，我们离开古炮台旧址，继续深入。一条狭窄的支径将我们引入一片相对阴凉的谷地。古道两侧，大片的柔枝莠竹匍匐蔓延，形成厚密的绿色绒毯，几乎覆盖了整个林下空间，其侵略性的扩张态势在此显露无遗，显著改变了原有的以蕨类、灌木为主的阴湿谷地植被地理格局。尽管知道它对生态的挤压，这铺天盖地的绿意，在酷暑中依然带来一丝视觉与心理上的清凉抚慰。烈日在这里变得温柔、迷情，柔枝莠竹如水似浪一般地轻轻摇晃着，古道在这里显得非常迷人。

当红色的栏杆跃入眼帘，我们知道，此行的地理制高点——步闲亭就快到了。攀登其上的步道极为陡峭，烈日像鞭子一样抽打在跋涉者身上，此刻又是正午，我只觉得浑身着了火一般。攀至步闲亭的最后一级石阶时，汗水已浸透衣背。这座2024年新建的观景台高达18.8米，踞于山巅如一枚时空坐标钉。

然而，登顶的回报是无与伦比的。立于亭中，360度的全景地理画卷轰然展开：近处，是我们一路跋涉而来的丘陵、谷地、农田、村落，如同微缩模型般铺陈脚下，清晰展现了浅丘宽谷地貌的典型特征；东南方向，长江蜿蜒流过江津城区所在的冲积小平原；最令人震撼的，是两条现代交通大动脉对古老地理屏障的强力突破——银亮的渝昆高铁如一道闪电，疾速穿行于隧道与高架，

以几乎笔直的线形刺穿连绵的青色山体；江泸北线高速公路则如一条灰白的巨蟒，利用现代工程技术跨越深谷，横跨过我们脚下的古道遗迹。

古代依赖自然地形艰难穿行的血脉，与现代以科技克服地形阻隔的神经，在此刻的制高点上，完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地理对话与时空交响。山巅的风猛烈而清凉，卷动着檐角的风铃，叮咚声在山谷间回荡。清越如丝，甘之如饴。突然，极度的疲惫袭来，我竟歪躺在朱红的亭凳上沉沉睡去。风声呼啸，仿佛群山在低语，讲述着亿万年川东褶皱带地质变迁的故事；成渝古道的历史，则如脚下奔腾不息的地理长河，裹挟着无数先民的足音，从沉睡的意识边缘流过。

下山时，我的双腿颤抖如坠棉絮，



成渝古道江津段的地理制高点步闲亭

索性拦下一辆乡间摩托，风驰电掣般掠过刚刚用脚步丈量过的起伏地形，在三河乡路上绕圈，热火呼啸，扑过身体发肤，只觉一切在梦中般。终于回到圣泉街道，但意犹未尽，又寻向附近的圣泉寺。可惜古寺山门紧闭，处于修缮中。却在寺后一片陡峭的、被浓密次生林覆盖的石灰岩崖壁下，意外发现了同治年间的“圣泉洞”。这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裂隙泉。残存的石刻与龙头石雕布满苔痕，一股清冽的泉水从岩缝中汩汩涌出，汇成小潭。

这是石灰岩地区地下水沿裂隙上升出露的明证，是喀斯特地貌的隐秘馈赠。水质清冽甘甜，昔日的商旅视其为“治疾圣水”，在此汲水疗伤祛疲。密林深处，光线幽暗，湿润的空气带着苔藓和腐殖土的气息，不知名的鸟鸣（或许是猫头鹰的低沉咕哝，或是布谷鸟的空灵回响）从岩壁和树冠间幽幽传来，为这处深藏的地理秘境增添了原始的野性与神秘。

六

这场 38 摄氏度高温下的地理寻访，汗水浸透了衣裳，脚步却精准地复刻了古道的地理脉络与起伏。每一块被磨亮的青石板，都记录着地貌的起伏和岩性的坚韧；每一座古桥、炮台、驿亭，都

占据着关键的地理节点；每一株花椒、茱萸、唇萼薄荷乃至柔枝莠竹，都是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态地理注脚；那由乡人合力修复的炮台与深藏崖壁下的圣泉，更是人类活动与地质、水文相互作用的生动见证。

徒步成渝古道江津段，是一场深层的阅读——阅读一本由岩层、水系、地貌、植被和人类足迹共同书写的巴蜀东部边缘地理志。我们用脚步的尺度，去理解先民如何在这片群山耸峙、河溪纵横、地质构造复杂的土地上，硬生生开辟出一条沟通巴蜀的生命线，串联起盆地与丘陵、江河与陆路。

疲惫的身躯下，是一个被古老地理深深震撼、与山川大地同频共振的灵魂。

这条 18 公里的石质长卷上，每道马蹄窝都是历史的句读，每块苔痕斑驳的条石都在讲述生生不息的通联渴望——从五尺官道到陆海新通道，巴蜀大地的开放基因早已刻进这些温润如玉的青石血脉里。而当我们以汗水和脚步重新激活这份记忆时，便完成了对千年行旅最庄重的致意：古道不孤，行者永续。

（作者单位：红岩杂志社）

责任编辑：张莉